

史界对热闹欢腾的社会科学界的向往。

人类由于自身知识和认识能力的局限，把其所面对的复杂世界“分而治之”，化简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许多分域，并因而产生许多相应的学科，它们综合在一起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复杂画卷和社会科学的广阔园地。然而历史的位置在哪里呢？焦虑由此而生。作为安慰的解答是，“历史”隐藏在这些社会事象的背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既往存在形态构成了历史学的研究对象；社会科学处理的是横切面的问题，纵切面的问题留给历史学处理。

这样回答未尝不可，但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发现历史学缺乏独立的位置，历史学成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等现实学科的附庸。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考虑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这一角度以承认历史知识和历史学在人类社会中具有永恒独立性为前提。

社会科学的形成是满足于建设各种知识体系或处理现实社会问题的需要，故而强调彼此间的区别与界限，每种社会科学都依赖于其特定的概念、范畴和方法论而形成，取消了这些规定，则这门学科也不复存在。但无论采用何种理论、何种视角、何种方法论，作为它们之基础的事件和知识始终独立存在，即它们的认识对象始终独立存在，而这些就构成历史，也可以说，历史是伴随人类社会始终并永远能独立存在的知识领域，它不依赖于任何理论而存在。比如说历史学和社会学都是以人的活动为研究对象，但历史研究强调的是知识和事件，社会学则强调以特定的方法和理论来规范某一类的事件和活动。社会学针对某种社会现象提出一种假设，然后搜集例子来证明或证伪这一假设，证明了则假设可以上升为理论，证伪了则又提出新的假设，如此循环。可见它具有从理论到理论的特点，且一定要借助特定的方法和规则。历史学则不然，只要能描述正确事件，并不规定必须采用哪种方式描述。

我认为历史学的根本特征之一在于它的纪实性叙事（与文学作品的虚构性叙事不同），也可以说纪实性叙事是历史学的题中应有之本义。极端地说，历史学作品如果不是叙事的，那么它只能算半成品，或者中间产品，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竹头木屑、一砖一瓦——以备构筑历史叙事大厦之用。《史记》是叙事的，司马迁到各地搜集的“放失旧闻”，就是中间产品。《资治通鉴》是叙事的，《通鉴考异》只能是“竹头木屑”。

历史学的叙事模式也经常受到每个时代所兴起的或流行的认识方法的影响，比如在19世纪的欧洲，受自然科学发展的影响，人们强调“证明”，追求达到数学的精确性，但进而人们发现有些东西无法用数学方法证明，但它也是真实可信的，由此而提出“事实”概念。“事实”概念首先是出现在物理实验领域，但历史学研究很快从中受益，淡化传说式的叙述色彩和从属于神学权威的叙述模式，强调证据，强调通过历史遗迹来重构历史。叙事不等于没有观点，叙事也需要有自己的角度和分析，也需要对所回顾的历史做出解释和说明，或者对前人的解释做出辩驳。于是，社会科学的概念和范畴就在这里发挥了作用。比如，对于武则天与唐高宗的关系，历史学家可以根据基本史料叙述其历史过程与细节，但是，也有学者从关注公众人物的私人生活空间的角度切入，用现代社会学的“家庭暴力”概念来分析武则天虐待诸子的现象。还有的人借用心理学的理论来分析唐高宗对比他年长的武则天的依赖，属于“恋母情结”。总之，用社会科学的概念来解释历史上发生的某些现象做出某种解释，由读者去评价是否接受这种解释。

尽管历史学的每一步发展都可以受益和受启于新的社会科学，借鉴其方法论和手段来对历史进行新的叙事。但历史作为一个基本的知识领域而可以独立存在，历史学也因此而特具独立性，不借助任何社会科学的方法和视角，依然可以完成其使命。历史学的使命就在于传递人类活动的记忆，采用何种方法来进行叙述和呈现，体现了叙述者的个人差异、喜好和时代影响，

史界对热闹欢腾的社会科学界的向往。

人类由于自身知识和认识能力的局限，把其所面对的复杂世界“分而治之”，化简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许多分域，并因而产生许多相应的学科，它们综合在一起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复杂画卷和社会科学的广阔园地。然而历史的位置在哪里呢？焦虑由此而生。作为安慰的解答是，“历史”隐藏在这些社会事象的背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既往存在形态构成了历史学的研究对象；社会科学处理的是横切面的问题，纵切面的问题留给历史学处理。

这样回答未尝不可，但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发现历史学缺乏独立的位置，历史学成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等现实学科的附庸。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考虑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这一角度以承认历史知识和历史学在人类社会中具有永恒独立性为前提。

社会科学的形成是满足于建设各种知识体系或处理现实社会问题的需要，故而强调彼此间的区别与界限，每种社会科学都依赖于其特定的概念、范畴和方法论而形成，取消了这些规定，则这门学科也不复存在。但无论采用何种理论、何种视角、何种方法论，作为它们之基础的事件和知识始终独立存在，即它们的认识对象始终独立存在，而这些就构成历史，也可以说，历史是伴随人类社会始终并永远能独立存在的知识领域，它不依赖于任何理论而存在。比如说历史学和社会学都是以人的活动为研究对象，但历史研究强调的是知识和事件，社会学则强调以特定的方法和理论来规范某一类的事件和活动。社会学针对某种社会现象提出一种假设，然后搜集例子来证明或证伪这一假设，证明了则假设可以上升为理论，证伪了则又提出新的假设，如此循环。可见它具有从理论到理论的特点，且一定要借助特定的方法和规则。历史学则不然，只要能描述正确事件，并不规定必须采用哪种方式描述。

我认为历史学的根本特征之一在于它的纪实性叙事（与文学作品的虚构性叙事不同），也可以说纪实性叙事是历史学的题中应有之本义。极端地说，历史学作品如果不是叙事的，那么它只能算半成品，或者中间产品，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竹头木屑、一砖一瓦——以备构筑历史叙事大厦之用。《史记》是叙事的，司马迁到各地搜集的“放失旧闻”，就是中间产品。《资治通鉴》是叙事的，《通鉴考异》只能是“竹头木屑”。

历史学的叙事模式也经常受到每个时代所兴起的或流行的认识方法的影响，比如在1世纪的欧洲，受自然科学发展的影响，人们强调“证明”，追求达到数学的精确性，但进而人们发现有些东西无法用数学方法证明，但它也是真实可信的，由此而提出“事实”概念。“事实”概念首先是出现在物理实验领域，但历史学研究很快从中受益，淡化传说式的叙述色彩和从属于神学权威的叙述模式，强调证据，强调通过历史遗迹来重构历史。叙事不等于没有观点，叙事也需要有自己的角度和分析，也需要对所回顾的历史做出解释和说明，或者对前人的解释做出辩驳。于是，社会科学的概念和范畴就在这里发挥了作用。比如，对于武则天与唐高宗的关系，历史学家可以根据基本史料叙述其历史过程与细节，但是，也有学者从关注公众人物的私人生活空间的角度切入，用现代社会学的“家庭暴力”概念来分析武则天虐待诸子的现象。还有的人借用心理学的理论来分析唐高宗对比他年长的武则天的依赖，属于“恋母情结”。总之，用社会科学的概念来解释历史上发生的某些现象做出某种解释，由读者去评价是否接受这种解释。

尽管历史学的每一步发展都可以受益和受启于新的社会科学，借鉴其方法论和手段来对历史进行新的叙事。但历史作为一个基本的知识领域而可以独立存在，历史学也因此而特具独立性，不借助任何社会科学的方法和视角，依然可以完成其使命。历史学的使命就在于传递人类活动的记忆，采用何种方法来进行叙述和呈现，体现了叙述者的个人差异、喜好和时代影响，

为什么要重提“政治史”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杨念群

（一）政治史为什么“消失”了

以上的标题看上去似乎有些耸人听闻，在人们的记忆中，“政治史”曾经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叙述系谱中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除了社会经济史因论题内容与之相呼应，可以配合其某些讨论而拥有较为显赫的位置外，“历史学”几乎完全可以和“政治史”划等号。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期，“政治史”这块“帝国版图”迅速被“文化史”和“社会史”等新兴学科所吞噬和肢解，最终沦落成为边缘学门。这倒不是说“政治史”没人研究了，而是其作为方法论支配地位的急剧衰落至为明显。“政治史”遭此际遇的大背景自然与中国史学界受当代西方理论影响，开始转向关注下层日常生活的“社会史”趋向有关。其严重程度几乎到了任何政治现象似乎只有涵化到“地方史”的框架里才能得到更为精细与合理的解释。

从表面上看这是西方知识话语霸权制约下的无奈结果，可毕竟也与我们传统的“政治史”缺乏解释能力和叙述魅力不无关系，除了在社会发展趋势的宏观叙事上颇有建树却又不乏机械教条的图解这个众所周知的原因之外，中国的政治史叙事基本是“制度史”研究的一种翻版，人们在政治史的表述中除了了解到堆积出的一系列事件序列和机械的制度描述外，根本无法感受到中国政治运作奇诡多变的态势和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关联意义。这就是为什么当人们读到钱穆先生那本薄薄的《中国历代政治之得失》时，不禁感叹政治制度史居然还可以这样被激情洋溢地书写的缘故，更不会惊讶于《叫魂》的畅销，因为那一桩满含多种意义却又长期被简单化解释的政治案件，毕竟让一个讲故事的高手重新生动地演绎了一遍。

然而，“政治史”终于还是被碎片化了，碎化到似乎只能是一种地方文化实践的表达形式。没人能否认“社会史”所表述出的千姿百态的魅力，传统笼罩的村庄，香烟缭绕的庙宇，温情脉脉的宗族，质朴有趣的民众生活……我也很欣赏从地方故事的脉络中去理解国家政治渗透和表现的地区史路径。（陈春声语）但这些路径毕竟都替代不了“政治”在跨地区意义上的整合作用。要理解这些整合作用，就要把“政治”当作一种相对独立的运转机制进行再研究。

把“政治”当作相对独立的因素进行研究的想法似乎并不新鲜，但我这里要强调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事件史”研究，而是要在新的视野里说明，近代以来的复杂情况使得“政治史”要想真正得到复兴，就必须在与其它研究取向、特别是与“社会史”研究的不断对话中寻求灵感，同时也要不断超越“地方性”的感觉重新建立起整体解释的意识。因为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自近代以来，“政治”对于千千万万的中国人而言，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是和许多血泪横飞的苦痛记忆密不可分，它既是“地方的”，也是“整体的”，既是上层的实践，也是下层的感受。尤其是在进入20世纪以后，“政治”由于现代国家建设的不断介入，具有了远较古代更加复杂的涵义，也非分析古代社会的研究手段所能胜任。

从“整体上”理解中国政治和从“地方上”理解政治肯定感觉不同。从整体而言，不少学者已经从各个角度对近代“政治”难以把握的复杂性做出说明，有一种观点最近越来越得到认同，即在中国近代社会的演变过程中，中国自身不但在不断建构起现代“民族—国家”的形象，以适应在强权林立的世界中竞争生存的需要，而且这种“国家”意识和制度的确立是不断通过

为什么要重提“政治史”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杨念群

（一）政治史为什么“消失”了

以上的标题看上去似乎有些耸人听闻，在人们的记忆中，“政治史”曾经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叙述系谱中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除了社会经济史因论题内容与之相呼应，可以配合其某些讨论而拥有较为显赫的位置外，“历史学”几乎完全可以和“政治史”划等号。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期，“政治史”这块“帝国版图”迅速被“文化史”和“社会史”等新兴学科所吞噬和肢解，最终沦落成为边缘学门。这倒不是说“政治史”没人研究了，而是其作为方法论支配地位的急剧衰落至为明显。“政治史”遭此际遇的大背景自然与中国史学界受当代西方理论影响，开始转向关注下层日常生活的“社会史”趋向有关。其严重程度几乎到了任何政治现象似乎只有涵化到“地方史”的框架里才能得到更为精细与合理的解释。

从表面上看这是西方知识话语霸权制约下的无奈结果，可毕竟也与我们传统的“政治史”缺乏解释能力和叙述魅力不无关系，除了在社会发展趋势的宏观叙事上颇有建树却又不乏机械教条的图解这个众所周知的原因之外，中国的政治史叙事基本是“制度史”研究的一种翻版，人们在政治史的表述中除了了解到堆积出的一系列事件序列和机械的制度描述外，根本无法感受到中国政治运作奇诡多变的态势和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关联意义。这就是为什么当人们读到钱穆先生那本薄薄的《中国历代政治之得失》时，不禁感叹政治制度史居然还可以这样被激情洋溢地书写的缘故，更不会惊讶于《叫魂》的畅销，因为那一桩满含多种意义却又长期被简单化解释的政治案件，毕竟让一个讲故事的高手重新生动地演绎了一遍。

然而，“政治史”终于还是被碎片化了，碎化到似乎只能是一种地方文化实践的表达形式。没人能否认“社会史”所表述出的千姿百态的魅力，传统笼罩的村庄，香烟缭绕的庙宇，温情脉脉的宗族，质朴有趣的民众生活……我也很欣赏从地方故事的脉络中去理解国家政治渗透和表现的地区史路径。（陈春声语）但这些路径毕竟都替代不了“政治”在跨地区意义上的整合作用。要理解这些整合作用，就要把“政治”当作一种相对独立的运转机制进行再研究。

把“政治”当作相对独立的因素进行研究的想法似乎并不新鲜，但我这里要强调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事件史”研究，而是要在新的视野里说明，近代以来的复杂情况使得“政治史”要想真正得到复兴，就必须在与其它研究取向、特别是与“社会史”研究的不断对话中寻求灵感，同时也要不断超越“地方性”的感觉重新建立起整体解释的意识。因为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自近代以来，“政治”对于千千万万的中国人而言，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是和许多血泪横飞的苦痛记忆密不可分，它既是“地方的”，也是“整体的”，既是上层的实践，也是下层的感受。尤其是在进入20世纪以后，“政治”由于现代国家建设的不断介入，具有了远较古代更加复杂的涵义，也非分析古代社会的研究手段所能胜任。

从“整体上”理解中国政治和从“地方上”理解政治肯定感觉不同。从整体而言，不少学者已经从各个角度对近代“政治”难以把握的复杂性做出说明，有一种观点最近越来越得到认同，即在中国近代社会的演变过程中，中国自身不但在不断建构起现代“民族—国家”的形象，以适应在强权林立的世界中竞争生存的需要，而且这种“国家”意识和制度的确立是不断通过

识”相对抗的一种反控制资源。其实近代以来，和西方有很大的不同，“政治”意识对中国生活的影响可谓是前无古人，近代中国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如何以政治力量支配地方社会的历史，所谓“地方性知识”也只能在如此的背景下才能得到准确理解。

最为关键的是，我们需要把研究过程中无意识地认同目前意识形态赋予的政治史解释框架，和自觉超越“地方性知识”的新教条而赋予政治史以新意的努力区别开来。所以，对“区域社会史”的理解也应更多地关注“政治”作为一种强有力的空间表现形式，是如何与“地方性知识”达成了某种张力关系的。“区域社会史”的研究最初是以抛弃传统意识形态式政治史研究而直接进入乡村社会的，可是在进入乡村之前，其潜在的台词是政治史在相对“社会史”研究时的次要性，然而最近的事实证明，如果对上层政治运作的历史没有突破性解释的话，那么，从事地方史研究后所得出的结论仍是值得怀疑的。

几乎与乡村研究的盛行同步，对“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讨论使人们产生了另一种冲动，想在城市中寻找出与西方近代启蒙运动所依赖的公共舆论场所相匹配的公共空间，结果是令人失望的，因为花费力气寻找出来的“空间”根本不具备创生现代因素的条件，甚至不具备对抗现代政治暴力干预的要素。有人甚至认为中国的城市在政治的强力支配下“消失了”，所以现在寻找城市公共空间的努力变得没有多大意义。与之相比，乡村却有可能复兴，那是因为乡村有“宗族”和“庙宇”作为对抗国家政治的支点。如果说到这种解释的弱点，那就是它无法理解“政治”之所以在近代中国会成为区别于以往的主导要素的复杂的跨地区原因，而且无法解读为什么只有到了近代，“政治”才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主调。

尽管有人提出从“地方史”的角度呈现“整体史”的框架和视野，但目前只有个别著作是从地方史的角度解读政治在基层运行的模式，大多数作品仍强调民众以各种文化和社会象征的形式与政治相对抗的行为。“地方史”对政治史的重新解读无疑贡献尤大，但却是从各自的地方性视野和脉络中来重绘这张地图的，所以如何拾掇起碎片重新拼贴出一幅整体的政治史图像，又使之区别于“革命史叙事”支配下的传统解释，仍是有待完成的有趣课题。

（三）重审“政治史”的意义

中国近代的“政治”与社会革命的特性密不可分。实际上也是当要面临解决社会问题时，近代政治的意义才会凸现。也正是因为近代社会所面临危机的复杂程度要远远高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所以在解读用政治解决问题的手段和方法时就会觉得更加难以把握。

近代以来，“政治”之所以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变得越来越有支配力，无疑与频繁发生的难以应对和解决的危机的严重性有关，也与外来势力的进入不断改变着中国人处理日常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状态密切相关。这些改变确实用传统的“政治史”等于“事件史”的简单逻辑和图解方式难以有更大的说服力。即使“革命”被描述为一种简单事件的排列过程，看上去颇有自主性，也无法解释它在普通中国人的生命中到底意味着什么。“地方史”研究方法的介入无疑会更加有效地回答人们脑海里被抽象化的“政治”如何在一些普通中国人的具体行为中发生作用，却又难以回答政治为什么会在超地区的范围内如此前无古人地改变着整个生活世界。

“革命”是解读近代中国为什么被如此彻底政治化的一把钥匙，但长期以来对“革命”的解释本身就是被意识形态化的领域，因此，要真正想实现“政治史”的突破，我们就需要把“革命”解释的意识形态化过程同样当作自己的“政治史”研究对象。

另外一个极端是把“革命”还原为有血有肉的个人际遇和行为，或者是基层社会破碎的动力之一，“革命”自身作为一种政治形态的表现机制反而被忽略了。也就是说，解读“政治”本

识”相对抗的一种反控制资源。其实近代以来，和西方有很大的不同，“政治”意识对中国生活的影响可谓是前无古人，近代中国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如何以政治力量支配地方社会的历史，所谓“地方性知识”也只能在如此的背景下才能得到准确理解。

最为关键的是，我们需要把研究过程中无意识地认同目前意识形态赋予的政治史解释框架，和自觉超越“地方性知识”的新教条而赋予政治史以新意的努力区别开来。所以，对“区域社会史”的理解也应更多地关注“政治”作为一种强有力的空间表现形式，是如何与“地方性知识”达成了某种张力关系的。“区域社会史”的研究最初是以抛弃传统意识形态式政治史研究而直接进入乡村社会的，可是在进入乡村之前，其潜在的台词是政治史在相对“社会史”研究时的次要性，然而最近的事实证明，如果对上层政治运作的历史没有突破性解释的话，那么，从事地方史研究后所得出的结论仍是值得怀疑的。

几乎与乡村研究的盛行同步，对“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讨论使人们产生了另一种冲动，想在城市中寻找出与西方近代启蒙运动所依赖的公共舆论场所相匹配的公共空间，结果是令人失望的，因为花费力气寻找出来的“空间”根本不具备创生现代因素的条件，甚至不具备对抗现代政治暴力干预的要素。有人甚至认为中国的城市在政治的强力支配下“消失了”，所以现在寻找城市公共空间的努力变得没有多大意义。与之相比，乡村却有可能复兴，那是因为乡村有“宗族”和“庙宇”作为对抗国家政治的支点。如果说到这种解释的弱点，那就是它无法理解“政治”之所以在近代中国会成为区别于以往的主导要素的复杂的跨地区原因，而且无法解读为什么只有到了近代，“政治”才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主调。

尽管有人提出从“地方史”的角度呈现“整体史”的框架和视野，但目前只有个别著作是从地方史的角度解读政治在基层运行的模式，大多数作品仍强调民众以各种文化和社会象征的形式与政治相对抗的行为。“地方史”对政治史的重新解读无疑贡献尤大，但却是从各自的地方性视野和脉络中来重绘这张地图的，所以如何拾掇起碎片重新拼贴出一幅整体的政治史图像，又使之区别于“革命史叙事”支配下的传统解释，仍是有待完成的有趣课题。

（三）重审“政治史”的意义

中国近代的“政治”与社会革命的特性密不可分。实际上也是当要面临解决社会问题时，近代政治的意义才会凸现。也正是因为近代社会所面临危机的复杂程度要远远高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所以在解读用政治解决问题的手段和方法时就会觉得更加难以把握。

近代以来，“政治”之所以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变得越来越有支配力，无疑与频繁发生的难以应对和解决的危机的严重性有关，也与外来势力的进入不断改变着中国人处理日常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状态密切相关。这些改变确实用传统的“政治史”等于“事件史”的简单逻辑和图解方式难以有更大的说服力。即使“革命”被描述为一种简单事件的排列过程，看上去颇有自主性，也无法解释它在普通中国人的生命中到底意味着什么。“地方史”研究方法的介入无疑会更加有效地回答人们脑海里被抽象化的“政治”如何在一些普通中国人的具体行为中发生作用，却又难以回答政治为什么会在超地区的范围内如此前无古人地改变着整个生活世界。

“革命”是解读近代中国为什么被如此彻底政治化的一把钥匙，但长期以来对“革命”的解释本身就是被意识形态化的领域，因此，要真正想实现“政治史”的突破，我们就需要把“革命”解释的意识形态化过程同样当作自己的“政治史”研究对象。

另外一个极端是把“革命”还原为有血有肉的个人际遇和行为，或者是基层社会破碎的动力之一，“革命”自身作为一种政治形态的表现机制反而被忽略了。也就是说，解读“政治”本

中国传统史学和当今中国的历史研究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从目的到方法，直至整个话语系统，早已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这种变化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一切从事历史研究的史学家的骨髓里面去了。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今天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所使用的基本概念，早都是西化了的，或是从西方引进过来的。像“社会”、“民族”、“阶级”、“国家”等等最常用的一些概念，就是源自于西方政治学、人类学或社会学等社会科学。这每一个概念的背后，都存在着一整套西方政治学、人类学或社会学的观念或解释体系。换言之，对于中国的历史学家来说，这些概念的使用，并不简单地只是换一个什么样的词汇来表达思想和叙述史实的问题，它在相当程度上其实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换。比如，当我们接受“社会”这个概念的时候，所接受的就绝不是一个孤立的字眼儿，它的背后是西方学者用来观察一个与国家既相联系、又相对应的代表着个人共同体的分析模式。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到马克思，再到当代的哈贝马斯，这些西方思想家在谈论“社会”这一概念时，都在不断地赋予它以新的思想内容。我们今天对“社会”的定义，包括人为地把“社会”划分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不同的子系统，并各自选择不同的面向研究历史，说到底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西方社会科学的分析模式的一种结果。很难认为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及其衍生的相关概念，比较其西方的意义，有了多么大的不同。

使用西方社会科学的种种概念来研究历史，其目的只有一个，也是为了更好地求真。但就求真而言，既有微观的问题，也有宏观的问题。中国传统史学对于微观的真实，包括凭借特有的时空和文化联系，深入中国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探寻其心路历程，确有相当见效的研究方法，也因此自有其不朽的生命力。但是，缺少西方社会科学基础的中国传统史学，其微观微不到构成社会基本成分的不同人群的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其宏观又宏不到关乎国家民族乃至社会发展的特有规律与趋向，即既不适宜分析太过复杂的社会现象，也不适宜总结出一个时期的历史特质，有其明显的不足。

这样说是不是太过贬低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功用呢？希望并非如此。但很显然，在西方社会科学的相关知识传入中国以前，我们看不到有哪部传统史学著作曾致力于此。这是因为，中国传统史学不具有工具性特点，无法像西方社会科学那样，发明出一种虚拟的结构，并由此衍生出相应的模式、过程、因果关系、互动系统之类的解释工具，因此它对带有整体性的太过复杂的多数历史问题，更多的只是满足于片断的、表象的或过程的描述。而今天，历史的解读仅仅停留在表象和过程的描述上，哪怕对一些人物的研究十分深入，也是不够的了。今天，我们只要想对以往的历史进行解读，就势必要借助于西方社会科学的某些理论和方法。不借用西方社会科学纯粹虚拟的结构，不对历史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面向和系统的区分，不使用国家、民族、阶级、族群等概念来定义不同的人群，不运用所有制、生产方式、利益关系和XX主义等等概念来界定不同人群之间的联系特性……就不可能处理任何复杂的历史课题，甚至无法将散落的看起来各自孤立的事实，有条理地组织起来，做出合理的解释。打一个不很准确、但可能形象一些的比方，中国传统史学和受到西方社会科学影响的近代以来历史学之间的区别，多少有点像中西医的不同。西医治病有解剖学为依据，有化学及物理学为基础，它可以利用科学的分析检测手段，对疾病的病灶、发生的原因和发病的程度，做出比较确切的诊断，因此对疾病的研究、诊治和预防分门别类，条理清楚，用药及施治针对性极强。而中医治病主要凭借的则是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辩证观念和医生个人用药的经验，凡病皆辨证论治，用药多在求人体内在之平衡，其治病的手段虽有许多西医不可替代的重要特点，但从现代医学的角度，中医需要借鉴西医之所长，不言自明。

中国传统史学和当今中国的历史研究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从目的到方法，直至整个话语系统，早已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这种变化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一切从事历史研究的史学家的骨髓里面去了。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今天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所使用的基本概念，早都是西化了的，或是从西方引进过来的。像“社会”、“民族”、“阶级”、“国家”等等最常用的一些概念，就是源自于西方政治学、人类学或社会学等社会科学。这每一个概念的背后，都存在着一整套西方政治学、人类学或社会学的观念或解释体系。换言之，对于中国的历史学家来说，这些概念的使用，并不简单地只是换一个什么样的词汇来表达思想和叙述史实的问题，它在相当程度上其实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换。比如，当我们接受“社会”这个概念的时候，所接受的就绝不是一个孤立的字眼儿，它的背后是西方学者用来观察一个与国家既相联系、又相对应的代表着个人共同体的分析模式。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到马克思，再到当代的哈贝马斯，这些西方思想家在谈论“社会”这一概念时，都在不断地赋予它以新的思想内容。我们今天对“社会”的定义，包括人为地把“社会”划分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不同的子系统，并各自选择不同的面向研究历史，说到底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西方社会科学的分析模式的一种结果。很难认为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及其衍生的相关概念，比较其西方的意义，有了多么大的不同。

使用西方社会科学的种种概念来研究历史，其目的只有一个，也是为了更好地求真。但就求真而言，既有微观的问题，也有宏观的问题。中国传统史学对于微观的真实，包括凭借特有的时空和文化联系，深入中国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探寻其心路历程，确有相当见效的研究方法，也因此自有其不朽的生命力。但是，缺少西方社会科学基础的中国传统史学，其微观微不到构成社会基本成分的不同人群的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其宏观又宏不到关乎国家民族乃至社会发展的特有规律与趋向，即既不适宜分析太过复杂的社会现象，也不适宜总结出一个时期的历史特质，有其明显的不足。

这样说是不是太过贬低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功用呢？希望并非如此。但很显然，在西方社会科学的相关知识传入中国以前，我们看不到有哪部传统史学著作曾致力于此。这是因为，中国传统史学不具有工具性特点，无法像西方社会科学那样，发明出一种虚拟的结构，并由此衍生出相应的模式、过程、因果关系、互动系统之类的解释工具，因此它对带有整体性的太过复杂的多数历史问题，更多的只是满足于片断的、表象的或过程的描述。而今天，历史的解读仅仅停留在表象和过程的描述上，哪怕对一些人物的研究十分深入，也是不够的了。今天，我们只要想对以往的历史进行解读，就势必要借助于西方社会科学的某些理论和方法。不借用西方社会科学纯粹虚拟的结构，不对历史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面向和系统的区分，不使用国家、民族、阶级、族群等概念来定义不同的人群，不运用所有制、生产方式、利益关系和XX主义等等概念来界定不同人群之间的联系特性……就不可能处理任何复杂的历史课题，甚至无法将散落的看起来各自孤立的事实，有条理地组织起来，做出合理的解释。打一个不很准确、但可能形象一些的比方，中国传统史学和受到西方社会科学影响的近代以来历史学之间的区别，多少有点像中西医的不同。西医治病有解剖学为依据，有化学及物理学为基础，它可以利用科学的分析检测手段，对疾病的病灶、发生的原因和发病的程度，做出比较确切的诊断，因此对疾病的研究、诊治和预防分门别类，条理清楚，用药及施治针对性极强。而中医治病主要凭借的则是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辩证观念和医生个人用药的经验，凡病皆辨证论治，用药多在求人体内在之平衡，其治病的手段虽有许多西医不可替代的重要特点，但从现代医学的角度，中医需要借鉴西医之所长，不言自明。

再清楚不过了。即使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一度接受了“五族共和”观念，其后的种种言论显示，他对中华国家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也仍旧是以古代传统的汉族国家为基础的。换言之，孙中山所爱的国家，以及他对国家主权、疆域和领土的理解，不仅在他的国家观形成过程中是变动着的，更与我们今天的认识有相当的差距。故即使我们发现孙中山确有试图出让满蒙权益的事实，也并不妨碍我们相信孙中山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

静下心来 看档案，踏踏实实 做学问

北京大学历史系 沈志华

《历史研究》创办 50 周年，没有搞大张旗鼓的庆祝活动，也没有营造热热闹闹的场面，而是召开这样一个小型的、实实在在的学术座谈会，体现了一种务实精神，我很赞同。

说到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我没有专门的研究，关于历史学的功能，也谈不出多么高深的见解。说句实在的话，我之所以在 1 年前生意正红火的时候放弃经商，重返历史研究的学术殿堂，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个人兴趣所至。在我看来，研究历史的基本的和主要的目的，就是复原历史，就是以当代人的意识、观念、认知和感受，在最新发现和发掘出来的更丰富、更详实的史料的基础上，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同一段历史进程，同一个历史人物，同一起历史事件，为什么会成为不同时代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就是因为人们的意识和观念转变了，认知和感受不同了，就是因为出现了许多新的碑文、书简、档案、文献以及当事人回忆录之类的史料。于是，人们就不得不对过去的事情进行重新审视。在我看来，研究历史就像做拼图游戏，那些零散的构件就是史料，而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对这些丰富多彩、混杂重叠、真真假假的构件进行鉴别、筛选，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再按照自己的思维逻辑把它们拼装在一起，形成一幅图像——也就是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当然，这幅图像越接近于它本来的面目，就表明拼图者的功力越深厚，他也越有理由感到自身存在的价值。历史研究就是这样一种吸引我的“游戏”，每当发现了一些重要的、足以改变历史图像的新构件，我就激动不已，就有一股创作的冲动；每当拼装出一幅得到人们认可的，哪怕是一幅很小的图像，我也会有一种沾沾自喜的成就感，而这种感受又鼓励和催动我马不停蹄地去进行新的探索。

就我研究的领域（苏联史、冷战史）而言，与十几年前的情况完全不同，现在的第一手史料不是太少，而是太多。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俄国学者编纂的专题档案文献集不断涌现，这些专集不仅公布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这样高层决策的档案，还有涉及外交、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和部门的档案，乃至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如苏共对舆论和媒体的控制、苏联政府对历次社会动乱的处理等，都有专门的文献集。此外，围绕冷战时期的一些重大国际事件，现在各有关国家（中国除外）的档案都已经全面开放。以 19 年的波匈事件为例，不仅匈牙利、波兰、俄国以及西方的档案大量公布出来，人们甚至找到了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等国家的相关档案。在这样丰富的史料基础上，只要研究者用心、刻苦，很多历史真相应该是可以探明的。但可惜的是，在我们目前的研究中，这些唾手可得的珍贵史料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利用，还是有很多人热衷于按照自己头脑中固有的成见或构想，变换各种角度和理念去解释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的原因，却很少踏踏实实地分析和解读已经呈现出来的丰富史料，首先搞清楚苏联历史发展本身的过程和一些重大事件，而历史的因果关系实际上就蕴藏在历史过程中。甚至还有人沿袭“文革”时期的做法，迎合某种政治需要去任意剪裁历史，这就更令人可

再清楚不过了。即使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一度接受了“五族共和”观念，其后的种种言论显示，他对中华国家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也仍旧是以古代传统的汉族国家为基础的。换言之，孙中山所爱的国家，以及他对国家主权、疆域和领土的理解，不仅在他的国家观形成过程中是变动着的，更与我们今天的认识有相当的差距。故即使我们发现孙中山确有试图出让满蒙权益的事实，也并不妨碍我们相信孙中山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

静下心来 看档案，踏踏实实 做学问

北京大学历史系 沈志华

《历史研究》创办 50 周年，没有搞大张旗鼓的庆祝活动，也没有营造热热闹闹的场面，而是召开这样一个小型的、实实在在的学术座谈会，体现了一种务实精神，我很赞同。

说到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我没有专门的研究，关于历史学的功能，也谈不出多么高深的见解。说句实在的话，我之所以在 1 年前生意正红火的时候放弃经商，重返历史研究的学术殿堂，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个人兴趣所至。在我看来，研究历史的基本的和主要的目的，就是复原历史，就是以当代人的意识、观念、认知和感受，在最新发现和发掘出来的更丰富、更详实的史料的基础上，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同一段历史进程，同一个历史人物，同一起历史事件，为什么会成为不同时代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就是因为人们的意识和观念转变了，认知和感受不同了，就是因为出现了许多新的碑文、书简、档案、文献以及当事人回忆录之类的史料。于是，人们就不得不对过去的事情进行重新审视。在我看来，研究历史就像做拼图游戏，那些零散的构件就是史料，而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对这些丰富多彩、混杂重叠、真真假假的构件进行鉴别、筛选，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再按照自己的思维逻辑把它们拼装在一起，形成一幅图像——也就是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当然，这幅图像越接近于它本来的面目，就表明拼图者的功力越深厚，他也越有理由感到自身存在的价值。历史研究就是这样一种吸引我的“游戏”，每当发现了一些重要的、足以改变历史图像的新构件，我就激动不已，就有一股创作的冲动；每当拼装出一幅得到人们认可的，哪怕是一幅很小的图像，我也会有一种沾沾自喜的成就感，而这种感受又鼓励和催动我马不停蹄地去进行新的探索。

就我研究的领域（苏联史、冷战史）而言，与十几年前的情况完全不同，现在的第一手史料不是太少，而是太多。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俄国学者编纂的专题档案文献集不断涌现，这些专集不仅公布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这样高层决策的档案，还有涉及外交、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和部门的档案，乃至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如苏共对舆论和媒体的控制、苏联政府对历次社会动乱的处理等，都有专门的文献集。此外，围绕冷战时期的一些重大国际事件，现在各有关国家（中国除外）的档案都已经全面开放。以 19 年的波匈事件为例，不仅匈牙利、波兰、俄国以及西方的档案大量公布出来，人们甚至找到了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等国家的相关档案。在这样丰富的史料基础上，只要研究者用心、刻苦，很多历史真相应该是可以探明的。但可惜的是，在我们目前的研究中，这些唾手可得的珍贵史料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利用，还是有很多人热衷于按照自己头脑中固有的成见或构想，变换各种角度和理念去解释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的原因，却很少踏踏实实地分析和解读已经呈现出来的丰富史料，首先搞清楚苏联历史发展本身的过程和一些重大事件，而历史的因果关系实际上就蕴藏在历史过程中。甚至还有人沿袭“文革”时期的做法，迎合某种政治需要去任意剪裁历史，这就更令人可

再清楚不过了。即使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一度接受了“五族共和”观念，其后的种种言论显示，他对中华国家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也仍旧是以古代传统的汉族国家为基础的。换言之，孙中山所爱的国家，以及他对国家主权、疆域和领土的理解，不仅在他的国家观形成过程中是变动着的，更与我们今天的认识有相当的差距。故即使我们发现孙中山确有试图出让满蒙权益的事实，也并不妨碍我们相信孙中山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

静下心来 看档案，踏踏实实做学问

北京大学历史系 沈志华

《历史研究》创办 50 周年，没有搞大张旗鼓的庆祝活动，也没有营造热热闹闹的场面，而是召开这样一个小型的、实实在在的学术座谈会，体现了一种务实精神，我很赞同。

说到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我没有专门的研究，关于历史学的功能，也谈不出多么高深的见解。说句实在的话，我之所以在 1 年前生意正红火的时候放弃经商，重返历史研究的学术殿堂，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个人兴趣所至。在我看来，研究历史的基本的和主要的目的，就是复原历史，就是以当代人的意识、观念、认知和感受，在最新发现和发掘出来的更丰富、更详实的史料的基础上，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同一段历史进程，同一个历史人物，同一起历史事件，为什么会成为不同时代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就是因为人们的意识和观念转变了，认知和感受不同了，就是因为出现了许多新的碑文、书简、档案、文献以及当事人回忆录之类的史料。于是，人们就不得不对过去的事情进行重新审视。在我看来，研究历史就像做拼图游戏，那些零散的构件就是史料，而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对这些丰富多彩、混杂重叠、真真假假的构件进行鉴别、筛选，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再按照自己的思维逻辑把它们拼装在一起，形成一幅图像——也就是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当然，这幅图像越接近于它本来的面目，就表明拼图者的功力越深厚，他也越有理由感到自身存在的价值。历史研究就是这样一种吸引我的“游戏”，每当发现了一些重要的、足以改变历史图像的新构件，我就激动不已，就有一股创作的冲动；每当拼装出一幅得到人们认可的，哪怕是一幅很小的图像，我也会有一种沾沾自喜的成就感，而这种感受又鼓励和催动我马不停蹄地去进行新的探索。

就我研究的领域（苏联史、冷战史）而言，与十几年前的情况完全不同，现在的第一手史料不是太少，而是太多。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俄国学者编纂的专题档案文献集不断涌现，这些专集不仅公布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这样高层决策的档案，还有涉及外交、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和部门的档案，乃至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如苏共对舆论和媒体的控制、苏联政府对历次社会动乱的处理等，都有专门的文献集。此外，围绕冷战时期的一些重大国际事件，现在各有关国家（中国除外）的档案都已经全面开放。以 19 年的波匈事件为例，不仅匈牙利、波兰、俄国以及西方的档案大量公布出来，人们甚至找到了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等国家的相关档案。在这样丰富的史料基础上，只要研究者用心、刻苦，很多历史真相应该是可以探明的。但可惜的是，在我们目前的研究中，这些唾手可得的珍贵史料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利用，还是有很多人热衷于按照自己头脑中固有的成见或构想，变换各种角度和理念去解释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的原因，却很少踏踏实实地分析和解读已经呈现出来的丰富史料，首先搞清楚苏联历史发展本身的过程和一些重大事件，而历史的因果关系实际上就蕴藏在历史过程中。甚至还有人沿袭“文革”时期的做法，迎合某种政治需要去任意剪裁历史，这就更令人可

再清楚不过了。即使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一度接受了“五族共和”观念，其后的种种言论显示，他对中华国家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也仍旧是以古代传统的汉族国家为基础的。换言之，孙中山所爱的国家，以及他对国家主权、疆域和领土的理解，不仅在他的国家观形成过程中是变动着的，更与我们今天的认识有相当的差距。故即使我们发现孙中山确有试图出让满蒙权益的事实，也并不妨碍我们相信孙中山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

静下心来 看档案，踏踏实实 做学问

北京大学历史系 沈志华

《历史研究》创办 5 周年，没有搞大张旗鼓的庆祝活动，也没有营造热热闹闹的场面，而是召开这样一个小型的、实实在在的学术座谈会，体现了一种务实精神，我很赞同。

说到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我没有专门的研究，关于历史学的功能，也谈不出多么高深的见解。说句实在的话，我之所以在 1 年前生意正红火的时候放弃经商，重返历史研究的学术殿堂，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个人兴趣所至。在我看来，研究历史的基本的和主要的目的，就是复原历史，就是以当代人的意识、观念、认知和感受，在最新发现和发掘出来的更丰富、更详实的史料的基础上，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同一段历史进程，同一个历史人物，同一起历史事件，为什么会成为不同时代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就是因为人们的意识和观念转变了，认知和感受不同了，就是因为出现了许多新的碑文、书简、档案、文献以及当事人回忆录之类的史料。于是，人们就不得不对过去的事情进行重新审视。在我看来，研究历史就像做拼图游戏，那些零散的构件就是史料，而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对这些丰富多彩、混杂重叠、真真假假的构件进行鉴别、筛选，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再按照自己的思维逻辑把它们拼装在一起，形成一幅图像——也就是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当然，这幅图像越接近于它本来的面目，就表明拼图者的功力越深厚，他也越有理由感到自身存在的价值。历史研究就是这样一种吸引我的“游戏”，每当发现了一些重要的、足以改变历史图像的新构件，我就激动不已，就有一股创作的冲动；每当拼装出一幅得到人们认可的，哪怕是一幅很小的图像，我也会有一种沾沾自喜的成就感，而这种感受又鼓励和催动我马不停蹄地去进行新的探索。

就我研究的领域（苏联史、冷战史）而言，与十几年前的情况完全不同，现在的第一手史料不是太少，而是太多。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俄国学者编纂的专题档案文献集不断涌现，这些专集不仅公布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这样高层决策的档案，还有涉及外交、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和部门的档案，乃至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如苏共对舆论和媒体的控制、苏联政府对历次社会动乱的处理等，都有专门的文献集。此外，围绕冷战时期的一些重大国际事件，现在各有关国家（中国除外）的档案都已经全面开放。以 19 年的波匈事件为例，不仅匈牙利、波兰、俄国以及西方的档案大量公布出来，人们甚至找到了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等国家的相关档案。在这样丰富的史料基础上，只要研究者用心、刻苦，很多历史真相应该是可以探明的。但可惜的是，在我们目前的研究中，这些唾手可得的珍贵史料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利用，还是有很多人热衷于按照自己头脑中固有的成见或构想，变换各种角度和理念去解释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的原因，却很少踏踏实实地分析和解读已经呈现出来的丰富史料，首先搞清楚苏联历史发展本身的过程和一些重大事件，而历史的因果关系实际上就蕴藏在历史过程中。甚至还有人沿袭“文革”时期的做法，迎合某种政治需要去任意剪裁历史，这就更令人可

再清楚不过了。即使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一度接受了“五族共和”观念，其后的种种言论显示，他对中华国家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也仍旧是以古代传统的汉族国家为基础的。换言之，孙中山所爱的国家，以及他对国家主权、疆域和领土的理解，不仅在他的国家观形成过程中是变动着的，更与我们今天的认识有相当的差距。故即使我们发现孙中山确有试图出让满蒙权益的事实，也并不妨碍我们相信孙中山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

静下心来 看档案，踏踏实实 做学问

北京大学历史系 沈志华

《历史研究》创办 50 周年，没有搞大张旗鼓的庆祝活动，也没有营造热热闹闹的场面，而是召开这样一个小型的、实实在在的学术座谈会，体现了一种务实精神，我很赞同。

说到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我没有专门的研究，关于历史学的功能，也谈不出多么高深的见解。说句实在的话，我之所以在 1 年前生意正红火的时候放弃经商，重返历史研究的学术殿堂，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个人兴趣所至。在我看来，研究历史的基本的和主要的目的，就是复原历史，就是以当代人的意识、观念、认知和感受，在最新发现和发掘出来的更丰富、更详实的史料的基础上，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同一段历史进程，同一个历史人物，同一起历史事件，为什么会成为不同时代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就是因为人们的意识和观念转变了，认知和感受不同了，就是因为出现了许多新的碑文、书简、档案、文献以及当事人回忆录之类的史料。于是，人们就不得不对过去的事情进行重新审视。在我看来，研究历史就像做拼图游戏，那些零散的构件就是史料，而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对这些丰富多彩、混杂重叠、真真假假的构件进行鉴别、筛选，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再按照自己的思维逻辑把它们拼装在一起，形成一幅图像——也就是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当然，这幅图像越接近于它本来的面目，就表明拼图者的功力越深厚，他也越有理由感到自身存在的价值。历史研究就是这样一种吸引我的“游戏”，每当发现了一些重要的、足以改变历史图像的新构件，我就激动不已，就有一股创作的冲动；每当拼装出一幅得到人们认可的，哪怕是一幅很小的图像，我也会有一种沾沾自喜的成就感，而这种感受又鼓励和催动我马不停蹄地去进行新的探索。

就我研究的领域（苏联史、冷战史）而言，与十几年前的情况完全不同，现在的第一手史料不是太少，而是太多。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俄国学者编纂的专题档案文献集不断涌现，这些专集不仅公布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这样高层决策的档案，还有涉及外交、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和部门的档案，乃至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如苏共对舆论和媒体的控制、苏联政府对历次社会动乱的处理等，都有专门的文献集。此外，围绕冷战时期的一些重大国际事件，现在各有关国家（中国除外）的档案都已经全面开放。以 19 年的波匈事件为例，不仅匈牙利、波兰、俄国以及西方的档案大量公布出来，人们甚至找到了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等国家的相关档案。在这样丰富的史料基础上，只要研究者用心、刻苦，很多历史真相应该是可以探明的。但可惜的是，在我们目前的研究中，这些唾手可得的珍贵史料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利用，还是有很多人热衷于按照自己头脑中固有的成见或构想，变换各种角度和理念去解释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的原因，却很少踏踏实实地分析和解读已经呈现出来的丰富史料，首先搞清楚苏联历史发展本身的过程和一些重大事件，而历史的因果关系实际上就蕴藏在历史过程中。甚至还有人沿袭“文革”时期的做法，迎合某种政治需要去任意剪裁历史，这就更令人可

再清楚不过了。即使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一度接受了“五族共和”观念，其后的种种言论显示，他对中华国家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也仍旧是以古代传统的汉族国家为基础的。换言之，孙中山所爱的国家，以及他对国家主权、疆域和领土的理解，不仅在他的国家观形成过程中是变动着的，更与我们今天的认识有相当的差距。故即使我们发现孙中山确有试图出让满蒙权益的事实，也并不妨碍我们相信孙中山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

静下心来 看档案，踏踏实实 做学问

北京大学历史系 沈志华

《历史研究》创办 50 周年，没有搞大张旗鼓的庆祝活动，也没有营造热热闹闹的场面，而是召开这样一个小型的、实实在在的学术座谈会，体现了一种务实精神，我很赞同。

说到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我没有专门的研究，关于历史学的功能，也谈不出多么高深的见解。说句实在的话，我之所以在 1 年前生意正红火的时候放弃经商，重返历史研究的学术殿堂，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个人兴趣所至。在我看来，研究历史的基本的和主要的目的，就是复原历史，就是以当代人的意识、观念、认知和感受，在最新发现和发掘出来的更丰富、更详实的史料的基础上，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同一段历史进程，同一个历史人物，同一起历史事件，为什么会成为不同时代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就是因为人们的意识和观念转变了，认知和感受不同了，就是因为出现了许多新的碑文、书简、档案、文献以及当事人回忆录之类的史料。于是，人们就不得不对过去的事情进行重新审视。在我看来，研究历史就像做拼图游戏，那些零散的构件就是史料，而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对这些丰富多彩、混杂重叠、真真假假的构件进行鉴别、筛选，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再按照自己的思维逻辑把它们拼装在一起，形成一幅图像——也就是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当然，这幅图像越接近于它本来的面目，就表明拼图者的功力越深厚，他也越有理由感到自身存在的价值。历史研究就是这样一种吸引我的“游戏”，每当发现了一些重要的、足以改变历史图像的新构件，我就激动不已，就有一股创作的冲动；每当拼装出一幅得到人们认可的，哪怕是一幅很小的图像，我也会有一种沾沾自喜的成就感，而这种感受又鼓励和催动我马不停蹄地去进行新的探索。

就我研究的领域（苏联史、冷战史）而言，与十几年前的情况完全不同，现在的第一手史料不是太少，而是太多。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俄国学者编纂的专题档案文献集不断涌现，这些专集不仅公布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这样高层决策的档案，还有涉及外交、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和部门的档案，乃至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如苏共对舆论和媒体的控制、苏联政府对历次社会动乱的处理等，都有专门的文献集。此外，围绕冷战时期的一些重大国际事件，现在各有关国家（中国除外）的档案都已经全面开放。以 19 年的波匈事件为例，不仅匈牙利、波兰、俄国以及西方的档案大量公布出来，人们甚至找到了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等国家的相关档案。在这样丰富的史料基础上，只要研究者用心、刻苦，很多历史真相应该是可以探明的。但可惜的是，在我们目前的研究中，这些唾手可得的珍贵史料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利用，还是有很多人热衷于按照自己头脑中固有的成见或构想，变换各种角度和理念去解释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的原因，却很少踏踏实实地分析和解读已经呈现出来的丰富史料，首先搞清楚苏联历史发展本身的过程和一些重大事件，而历史的因果关系实际上就蕴藏在历史过程中。甚至还有人沿袭“文革”时期的做法，迎合某种政治需要去任意剪裁历史，这就更令人可

再清楚不过了。即使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一度接受了“五族共和”观念，其后的种种言论显示，他对中华国家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也仍旧是以古代传统的汉族国家为基础的。换言之，孙中山所爱的国家，以及他对国家主权、疆域和领土的理解，不仅在他的国家观形成过程中是变动着的，更与我们今天的认识有相当的差距。故即使我们发现孙中山确有试图出让满蒙权益的事实，也并不妨碍我们相信孙中山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

静下心来 看档案，踏踏实实 做学问

北京大学历史系 沈志华

《历史研究》创办 50 周年，没有搞大张旗鼓的庆祝活动，也没有营造热热闹闹的场面，而是召开这样一个小型的、实实在在的学术座谈会，体现了一种务实精神，我很赞同。

说到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我没有专门的研究，关于历史学的功能，也谈不出多么高深的见解。说句实在的话，我之所以在 1 年前生意正红火的时候放弃经商，重返历史研究的学术殿堂，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个人兴趣所至。在我看来，研究历史的基本的和主要的目的，就是复原历史，就是以当代人的意识、观念、认知和感受，在最新发现和发掘出来的更丰富、更详实的史料的基础上，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同一段历史进程，同一个历史人物，同一起历史事件，为什么会成为不同时代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就是因为人们的意识和观念转变了，认知和感受不同了，就是因为出现了许多新的碑文、书简、档案、文献以及当事人回忆录之类的史料。于是，人们就不得不对过去的事情进行重新审视。在我看来，研究历史就像做拼图游戏，那些零散的构件就是史料，而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对这些丰富多彩、混杂重叠、真真假假的构件进行鉴别、筛选，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再按照自己的思维逻辑把它们拼装在一起，形成一幅图像——也就是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当然，这幅图像越接近于它本来的面目，就表明拼图者的功力越深厚，他也越有理由感到自身存在的价值。历史研究就是这样一种吸引我的“游戏”，每当发现了一些重要的、足以改变历史图像的新构件，我就激动不已，就有一股创作的冲动；每当拼装出一幅得到人们认可的，哪怕是一幅很小的图像，我也会有一种沾沾自喜的成就感，而这种感受又鼓励和催动我马不停蹄地去进行新的探索。

就我研究的领域（苏联史、冷战史）而言，与十几年前的情况完全不同，现在的第一手史料不是太少，而是太多。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俄国学者编纂的专题档案文献集不断涌现，这些专集不仅公布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这样高层决策的档案，还有涉及外交、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和部门的档案，乃至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如苏共对舆论和媒体的控制、苏联政府对历次社会动乱的处理等，都有专门的文献集。此外，围绕冷战时期的一些重大国际事件，现在各有关国家（中国除外）的档案都已经全面开放。以 19 年的波匈事件为例，不仅匈牙利、波兰、俄国以及西方的档案大量公布出来，人们甚至找到了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等国家的相关档案。在这样丰富的史料基础上，只要研究者用心、刻苦，很多历史真相应该是可以探明的。但可惜的是，在我们目前的研究中，这些唾手可得的珍贵史料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利用，还是有很多人热衷于按照自己头脑中固有的成见或构想，变换各种角度和理念去解释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的原因，却很少踏踏实实地分析和解读已经呈现出来的丰富史料，首先搞清楚苏联历史发展本身的过程和一些重大事件，而历史的因果关系实际上就蕴藏在历史过程中。甚至还有人沿袭“文革”时期的做法，迎合某种政治需要去任意剪裁历史，这就更令人可

再清楚不过了。即使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一度接受了“五族共和”观念，其后的种种言论显示，他对中华国家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也仍旧是以古代传统的汉族国家为基础的。换言之，孙中山所爱的国家，以及他对国家主权、疆域和领土的理解，不仅在他的国家观形成过程中是变动着的，更与我们今天的认识有相当的差距。故即使我们发现孙中山确有试图出让满蒙权益的事实，也并不妨碍我们相信孙中山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

静下心来 看档案，踏踏实实 做学问

北京大学历史系 沈志华

《历史研究》创办 50 周年，没有搞大张旗鼓的庆祝活动，也没有营造热热闹闹的场面，而是召开这样一个小型的、实实在在的学术座谈会，体现了一种务实精神，我很赞同。

说到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我没有专门的研究，关于历史学的功能，也谈不出多么高深的见解。说句实在的话，我之所以在 1 年前生意正红火的时候放弃经商，重返历史研究的学术殿堂，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个人兴趣所至。在我看来，研究历史的基本的和主要的目的，就是复原历史，就是以当代人的意识、观念、认知和感受，在最新发现和发掘出来的更丰富、更详实的史料的基础上，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同一段历史进程，同一个历史人物，同一起历史事件，为什么会成为不同时代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就是因为人们的意识和观念转变了，认知和感受不同了，就是因为出现了许多新的碑文、书简、档案、文献以及当事人回忆录之类的史料。于是，人们就不得不对过去的事情进行重新审视。在我看来，研究历史就像做拼图游戏，那些零散的构件就是史料，而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对这些丰富多彩、混杂重叠、真真假假的构件进行鉴别、筛选，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再按照自己的思维逻辑把它们拼装在一起，形成一幅图像——也就是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当然，这幅图像越接近于它本来的面目，就表明拼图者的功力越深厚，他也越有理由感到自身存在的价值。历史研究就是这样一种吸引我的“游戏”，每当发现了一些重要的、足以改变历史图像的新构件，我就激动不已，就有一股创作的冲动；每当拼装出一幅得到人们认可的，哪怕是一幅很小的图像，我也会有一种沾沾自喜的成就感，而这种感受又鼓励和催动我马不停蹄地去进行新的探索。

就我研究的领域（苏联史、冷战史）而言，与十几年前的情况完全不同，现在的第一手史料不是太少，而是太多。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俄国学者编纂的专题档案文献集不断涌现，这些专集不仅公布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这样高层决策的档案，还有涉及外交、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和部门的档案，乃至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如苏共对舆论和媒体的控制、苏联政府对历次社会动乱的处理等，都有专门的文献集。此外，围绕冷战时期的一些重大国际事件，现在各有关国家（中国除外）的档案都已经全面开放。以 19 年的波匈事件为例，不仅匈牙利、波兰、俄国以及西方的档案大量公布出来，人们甚至找到了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等国家的相关档案。在这样丰富的史料基础上，只要研究者用心、刻苦，很多历史真相应该是可以探明的。但可惜的是，在我们目前的研究中，这些唾手可得的珍贵史料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利用，还是有很多人热衷于按照自己头脑中固有的成见或构想，变换各种角度和理念去解释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的原因，却很少踏踏实实地分析和解读已经呈现出来的丰富史料，首先搞清楚苏联历史发展本身的过程和一些重大事件，而历史的因果关系实际上就蕴藏在历史过程中。甚至还有人沿袭“文革”时期的做法，迎合某种政治需要去任意剪裁历史，这就更令人可

再清楚不过了。即使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一度接受了“五族共和”观念，其后的种种言论显示，他对中华国家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也仍旧是以古代传统的汉族国家为基础的。换言之，孙中山所爱的国家，以及他对国家主权、疆域和领土的理解，不仅在他的国家观形成过程中是变动着的，更与我们今天的认识有相当的差距。故即使我们发现孙中山确有试图出让满蒙权益的事实，也并不妨碍我们相信孙中山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

静下心来 看档案，踏踏实实 做学问

北京大学历史系 沈志华

《历史研究》创办 50 周年，没有搞大张旗鼓的庆祝活动，也没有营造热热闹闹的场面，而是召开这样一个小型的、实实在在的学术座谈会，体现了一种务实精神，我很赞同。

说到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我没有专门的研究，关于历史学的功能，也谈不出多么高深的见解。说句实在的话，我之所以在 1 年前生意正红火的时候放弃经商，重返历史研究的学术殿堂，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个人兴趣所至。在我看来，研究历史的基本的和主要的目的，就是复原历史，就是以当代人的意识、观念、认知和感受，在最新发现和发掘出来的更丰富、更详实的史料的基础上，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同一段历史进程，同一个历史人物，同一起历史事件，为什么会成为不同时代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就是因为人们的意识和观念转变了，认知和感受不同了，就是因为出现了许多新的碑文、书简、档案、文献以及当事人回忆录之类的史料。于是，人们就不得不对过去的事情进行重新审视。在我看来，研究历史就像做拼图游戏，那些零散的构件就是史料，而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对这些丰富多彩、混杂重叠、真真假假的构件进行鉴别、筛选，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再按照自己的思维逻辑把它们拼装在一起，形成一幅图像——也就是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当然，这幅图像越接近于它本来的面目，就表明拼图者的功力越深厚，他也越有理由感到自身存在的价值。历史研究就是这样一种吸引我的“游戏”，每当发现了一些重要的、足以改变历史图像的新构件，我就激动不已，就有一股创作的冲动；每当拼装出一幅得到人们认可的，哪怕是一幅很小的图像，我也会有一种沾沾自喜的成就感，而这种感受又鼓励和催动我马不停蹄地去进行新的探索。

就我研究的领域（苏联史、冷战史）而言，与十几年前的情况完全不同，现在的第一手史料不是太少，而是太多。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俄国学者编纂的专题档案文献集不断涌现，这些专集不仅公布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这样高层决策的档案，还有涉及外交、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和部门的档案，乃至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如苏共对舆论和媒体的控制、苏联政府对历次社会动乱的处理等，都有专门的文献集。此外，围绕冷战时期的一些重大国际事件，现在各有关国家（中国除外）的档案都已经全面开放。以 19 年的波匈事件为例，不仅匈牙利、波兰、俄国以及西方的档案大量公布出来，人们甚至找到了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等国家的相关档案。在这样丰富的史料基础上，只要研究者用心、刻苦，很多历史真相应该是可以探明的。但可惜的是，在我们目前的研究中，这些唾手可得的珍贵史料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利用，还是有很多人热衷于按照自己头脑中固有的成见或构想，变换各种角度和理念去解释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的原因，却很少踏踏实实地分析和解读已经呈现出来的丰富史料，首先搞清楚苏联历史发展本身的过程和一些重大事件，而历史的因果关系实际上就蕴藏在历史过程中。甚至还有人沿袭“文革”时期的做法，迎合某种政治需要去任意剪裁历史，这就更令人可

再清楚不过了。即使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一度接受了“五族共和”观念，其后的种种言论显示，他对中华国家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也仍旧是以古代传统的汉族国家为基础的。换言之，孙中山所爱的国家，以及他对国家主权、疆域和领土的理解，不仅在他的国家观形成过程中是变动着的，更与我们今天的认识有相当的差距。故即使我们发现孙中山确有试图出让满蒙权益的事实，也并不妨碍我们相信孙中山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

静下心来 看档案，踏踏实实 做学问

北京大学历史系 沈志华

《历史研究》创办 50 周年，没有搞大张旗鼓的庆祝活动，也没有营造热热闹闹的场面，而是召开这样一个小型的、实实在在的学术座谈会，体现了一种务实精神，我很赞同。

说到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我没有专门的研究，关于历史学的功能，也谈不出多么高深的见解。说句实在的话，我之所以在 1 年前生意正红火的时候放弃经商，重返历史研究的学术殿堂，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个人兴趣所至。在我看来，研究历史的基本的和主要的目的，就是复原历史，就是以当代人的意识、观念、认知和感受，在最新发现和发掘出来的更丰富、更详实的史料的基础上，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同一段历史进程，同一个历史人物，同一起历史事件，为什么会成为不同时代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就是因为人们的意识和观念转变了，认知和感受不同了，就是因为出现了许多新的碑文、书简、档案、文献以及当事人回忆录之类的史料。于是，人们就不得不对过去的事情进行重新审视。在我看来，研究历史就像做拼图游戏，那些零散的构件就是史料，而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对这些丰富多彩、混杂重叠、真真假假的构件进行鉴别、筛选，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再按照自己的思维逻辑把它们拼装在一起，形成一幅图像——也就是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当然，这幅图像越接近于它本来的面目，就表明拼图者的功力越深厚，他也越有理由感到自身存在的价值。历史研究就是这样一种吸引我的“游戏”，每当发现了一些重要的、足以改变历史图像的新构件，我就激动不已，就有一股创作的冲动；每当拼装出一幅得到人们认可的，哪怕是一幅很小的图像，我也会有一种沾沾自喜的成就感，而这种感受又鼓励和催动我马不停蹄地去进行新的探索。

就我研究的领域（苏联史、冷战史）而言，与十几年前的情况完全不同，现在的第一手史料不是太少，而是太多。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俄国学者编纂的专题档案文献集不断涌现，这些专集不仅公布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这样高层决策的档案，还有涉及外交、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和部门的档案，乃至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如苏共对舆论和媒体的控制、苏联政府对历次社会动乱的处理等，都有专门的文献集。此外，围绕冷战时期的一些重大国际事件，现在各有关国家（中国除外）的档案都已经全面开放。以 19 年的波匈事件为例，不仅匈牙利、波兰、俄国以及西方的档案大量公布出来，人们甚至找到了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等国家的相关档案。在这样丰富的史料基础上，只要研究者用心、刻苦，很多历史真相应该是可以探明的。但可惜的是，在我们目前的研究中，这些唾手可得的珍贵史料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利用，还是有很多人热衷于按照自己头脑中固有的成见或构想，变换各种角度和理念去解释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的原因，却很少踏踏实实地分析和解读已经呈现出来的丰富史料，首先搞清楚苏联历史发展本身的过程和一些重大事件，而历史的因果关系实际上就蕴藏在历史过程中。甚至还有人沿袭“文革”时期的做法，迎合某种政治需要去任意剪裁历史，这就更令人可

再清楚不过了。即使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一度接受了“五族共和”观念，其后的种种言论显示，他对中华国家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也仍旧是以古代传统的汉族国家为基础的。换言之，孙中山所爱的国家，以及他对国家主权、疆域和领土的理解，不仅在他的国家观形成过程中是变动着的，更与我们今天的认识有相当的差距。故即使我们发现孙中山确有试图出让满蒙权益的事实，也并不妨碍我们相信孙中山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

静下心来 看档案，踏踏实实 做学问

北京大学历史系 沈志华

《历史研究》创办 50 周年，没有搞大张旗鼓的庆祝活动，也没有营造热热闹闹的场面，而是召开这样一个小型的、实实在在的学术座谈会，体现了一种务实精神，我很赞同。

说到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我没有专门的研究，关于历史学的功能，也谈不出多么高深的见解。说句实在的话，我之所以在 1 年前生意正红火的时候放弃经商，重返历史研究的学术殿堂，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个人兴趣所至。在我看来，研究历史的基本的和主要的目的，就是复原历史，就是以当代人的意识、观念、认知和感受，在最新发现和发掘出来的更丰富、更详实的史料的基础上，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同一段历史进程，同一个历史人物，同一起历史事件，为什么会成为不同时代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就是因为人们的意识和观念转变了，认知和感受不同了，就是因为出现了许多新的碑文、书简、档案、文献以及当事人回忆录之类的史料。于是，人们就不得不对过去的事情进行重新审视。在我看来，研究历史就像做拼图游戏，那些零散的构件就是史料，而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对这些丰富多彩、混杂重叠、真真假假的构件进行鉴别、筛选，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再按照自己的思维逻辑把它们拼装在一起，形成一幅图像——也就是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当然，这幅图像越接近于它本来的面目，就表明拼图者的功力越深厚，他也越有理由感到自身存在的价值。历史研究就是这样一种吸引我的“游戏”，每当发现了一些重要的、足以改变历史图像的新构件，我就激动不已，就有一股创作的冲动；每当拼装出一幅得到人们认可的，哪怕是一幅很小的图像，我也会有一种沾沾自喜的成就感，而这种感受又鼓励和催动我马不停蹄地去进行新的探索。

就我研究的领域（苏联史、冷战史）而言，与十几年前的情况完全不同，现在的第一手史料不是太少，而是太多。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俄国学者编纂的专题档案文献集不断涌现，这些专集不仅公布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这样高层决策的档案，还有涉及外交、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和部门的档案，乃至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如苏共对舆论和媒体的控制、苏联政府对历次社会动乱的处理等，都有专门的文献集。此外，围绕冷战时期的一些重大国际事件，现在各有关国家（中国除外）的档案都已经全面开放。以 19 年的波匈事件为例，不仅匈牙利、波兰、俄国以及西方的档案大量公布出来，人们甚至找到了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等国家的相关档案。在这样丰富的史料基础上，只要研究者用心、刻苦，很多历史真相应该是可以探明的。但可惜的是，在我们目前的研究中，这些唾手可得的珍贵史料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利用，还是有很多人热衷于按照自己头脑中固有的成见或构想，变换各种角度和理念去解释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的原因，却很少踏踏实实地分析和解读已经呈现出来的丰富史料，首先搞清楚苏联历史发展本身的过程和一些重大事件，而历史的因果关系实际上就蕴藏在历史过程中。甚至还有人沿袭“文革”时期的做法，迎合某种政治需要去任意剪裁历史，这就更令人可

再清楚不过了。即使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一度接受了“五族共和”观念，其后的种种言论显示，他对中华国家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也仍旧是以古代传统的汉族国家为基础的。换言之，孙中山所爱的国家，以及他对国家主权、疆域和领土的理解，不仅在他的国家观形成过程中是变动着的，更与我们今天的认识有相当的差距。故即使我们发现孙中山确有试图出让满蒙权益的事实，也并不妨碍我们相信孙中山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

静下心来 看档案，踏踏实实 做学问

北京大学历史系 沈志华

《历史研究》创办 5 周年，没有搞大张旗鼓的庆祝活动，也没有营造热热闹闹的场面，而是召开这样一个小型的、实实在在的学术座谈会，体现了一种务实精神，我很赞同。

说到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我没有专门的研究，关于历史学的功能，也谈不出多么高深的见解。说句实在的话，我之所以在 1 年前生意正红火的时候放弃经商，重返历史研究的学术殿堂，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个人兴趣所至。在我看来，研究历史的基本的和主要的目的，就是复原历史，就是以当代人的意识、观念、认知和感受，在最新发现和发掘出来的更丰富、更详实的史料的基础上，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同一段历史进程，同一个历史人物，同一起历史事件，为什么会成为不同时代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就是因为人们的意识和观念转变了，认知和感受不同了，就是因为出现了许多新的碑文、书简、档案、文献以及当事人回忆录之类的史料。于是，人们就不得不对过去的事情进行重新审视。在我看来，研究历史就像做拼图游戏，那些零散的构件就是史料，而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对这些丰富多彩、混杂重叠、真真假假的构件进行鉴别、筛选，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再按照自己的思维逻辑把它们拼装在一起，形成一幅图像——也就是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当然，这幅图像越接近于它本来的面目，就表明拼图者的功力越深厚，他也越有理由感到自身存在的价值。历史研究就是这样一种吸引我的“游戏”，每当发现了一些重要的、足以改变历史图像的新构件，我就激动不已，就有一股创作的冲动；每当拼装出一幅得到人们认可的，哪怕是一幅很小的图像，我也会有一种沾沾自喜的成就感，而这种感受又鼓励和催动我马不停蹄地去进行新的探索。

就我研究的领域（苏联史、冷战史）而言，与十几年前的情况完全不同，现在的第一手史料不是太少，而是太多。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俄国学者编纂的专题档案文献集不断涌现，这些专集不仅公布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这样高层决策的档案，还有涉及外交、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和部门的档案，乃至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如苏共对舆论和媒体的控制、苏联政府对历次社会动乱的处理等，都有专门的文献集。此外，围绕冷战时期的一些重大国际事件，现在各有关国家（中国除外）的档案都已经全面开放。以 19 年的波匈事件为例，不仅匈牙利、波兰、俄国以及西方的档案大量公布出来，人们甚至找到了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等国家的相关档案。在这样丰富的史料基础上，只要研究者用心、刻苦，很多历史真相应该是可以探明的。但可惜的是，在我们目前的研究中，这些唾手可得的珍贵史料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利用，还是有很多人热衷于按照自己头脑中固有的成见或构想，变换各种角度和理念去解释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的原因，却很少踏踏实实地分析和解读已经呈现出来的丰富史料，首先搞清楚苏联历史发展本身的过程和一些重大事件，而历史的因果关系实际上就蕴藏在历史过程中。甚至还有人沿袭“文革”时期的做法，迎合某种政治需要去任意剪裁历史，这就更令人可

再清楚不过了。即使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一度接受了“五族共和”观念，其后的种种言论显示，他对中华国家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也仍旧是以古代传统的汉族国家为基础的。换言之，孙中山所爱的国家，以及他对国家主权、疆域和领土的理解，不仅在他的国家观形成过程中是变动着的，更与我们今天的认识有相当的差距。故即使我们发现孙中山确有试图出让满蒙权益的事实，也并不妨碍我们相信孙中山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

静下心来 看档案，踏踏实实 做学问

北京大学历史系 沈志华

《历史研究》创办 50 周年，没有搞大张旗鼓的庆祝活动，也没有营造热热闹闹的场面，而是召开这样一个小型的、实实在在的学术座谈会，体现了一种务实精神，我很赞同。

说到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我没有专门的研究，关于历史学的功能，也谈不出多么高深的见解。说句实在的话，我之所以在 1 年前生意正红火的时候放弃经商，重返历史研究的学术殿堂，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个人兴趣所至。在我看来，研究历史的基本的和主要的目的，就是复原历史，就是以当代人的意识、观念、认知和感受，在最新发现和发掘出来的更丰富、更详实的史料的基础上，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同一段历史进程，同一个历史人物，同一起历史事件，为什么会成为不同时代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就是因为人们的意识和观念转变了，认知和感受不同了，就是因为出现了许多新的碑文、书简、档案、文献以及当事人回忆录之类的史料。于是，人们就不得不对过去的事情进行重新审视。在我看来，研究历史就像做拼图游戏，那些零散的构件就是史料，而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对这些丰富多彩、混杂重叠、真真假假的构件进行鉴别、筛选，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再按照自己的思维逻辑把它们拼装在一起，形成一幅图像——也就是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当然，这幅图像越接近于它本来的面目，就表明拼图者的功力越深厚，他也越有理由感到自身存在的价值。历史研究就是这样一种吸引我的“游戏”，每当发现了一些重要的、足以改变历史图像的新构件，我就激动不已，就有一股创作的冲动；每当拼装出一幅得到人们认可的，哪怕是一幅很小的图像，我也会有一种沾沾自喜的成就感，而这种感受又鼓励和催动我马不停蹄地去进行新的探索。

就我研究的领域（苏联史、冷战史）而言，与十几年前的情况完全不同，现在的第一手史料不是太少，而是太多。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俄国学者编纂的专题档案文献集不断涌现，这些专集不仅公布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这样高层决策的档案，还有涉及外交、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和部门的档案，乃至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如苏共对舆论和媒体的控制、苏联政府对历次社会动乱的处理等，都有专门的文献集。此外，围绕冷战时期的一些重大国际事件，现在各有关国家（中国除外）的档案都已经全面开放。以 19 年的波匈事件为例，不仅匈牙利、波兰、俄国以及西方的档案大量公布出来，人们甚至找到了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等国家的相关档案。在这样丰富的史料基础上，只要研究者用心、刻苦，很多历史真相应该是可以探明的。但可惜的是，在我们目前的研究中，这些唾手可得的珍贵史料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利用，还是有很多人热衷于按照自己头脑中固有的成见或构想，变换各种角度和理念去解释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的原因，却很少踏踏实实地分析和解读已经呈现出来的丰富史料，首先搞清楚苏联历史发展本身的过程和一些重大事件，而历史的因果关系实际上就蕴藏在历史过程中。甚至还有人沿袭“文革”时期的做法，迎合某种政治需要去任意剪裁历史，这就更令人可

再清楚不过了。即使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一度接受了“五族共和”观念，其后的种种言论显示，他对中华国家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也仍旧是以古代传统的汉族国家为基础的。换言之，孙中山所爱的国家，以及他对国家主权、疆域和领土的理解，不仅在他的国家观形成过程中是变动着的，更与我们今天的认识有相当的差距。故即使我们发现孙中山确有试图出让满蒙权益的事实，也并不妨碍我们相信孙中山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

静下心来 看档案，踏踏实实做学问

北京大学历史系 沈志华

《历史研究》创办 50 周年，没有搞大张旗鼓的庆祝活动，也没有营造热热闹闹的场面，而是召开这样一个小型的、实实在在的学术座谈会，体现了一种务实精神，我很赞同。

说到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我没有专门的研究，关于历史学的功能，也谈不出多么高深的见解。说句实在的话，我之所以在 1 年前生意正红火的时候放弃经商，重返历史研究的学术殿堂，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个人兴趣所至。在我看来，研究历史的基本的和主要的目的，就是复原历史，就是以当代人的意识、观念、认知和感受，在最新发现和发掘出来的更丰富、更详实的史料的基础上，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同一段历史进程，同一个历史人物，同一起历史事件，为什么会成为不同时代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就是因为人们的意识和观念转变了，认知和感受不同了，就是因为出现了许多新的碑文、书简、档案、文献以及当事人回忆录之类的史料。于是，人们就不得不对过去的事情进行重新审视。在我看来，研究历史就像做拼图游戏，那些零散的构件就是史料，而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对这些丰富多彩、混杂重叠、真真假假的构件进行鉴别、筛选，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再按照自己的思维逻辑把它们拼装在一起，形成一幅图像——也就是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当然，这幅图像越接近于它本来的面目，就表明拼图者的功力越深厚，他也越有理由感到自身存在的价值。历史研究就是这样一种吸引我的“游戏”，每当发现了一些重要的、足以改变历史图像的新构件，我就激动不已，就有一股创作的冲动；每当拼装出一幅得到人们认可的，哪怕是一幅很小的图像，我也会有一种沾沾自喜的成就感，而这种感受又鼓励和催动我马不停蹄地去进行新的探索。

就我研究的领域（苏联史、冷战史）而言，与十几年前的情况完全不同，现在的第一手史料不是太少，而是太多。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俄国学者编纂的专题档案文献集不断涌现，这些专集不仅公布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这样高层决策的档案，还有涉及外交、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和部门的档案，乃至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如苏共对舆论和媒体的控制、苏联政府对历次社会动乱的处理等，都有专门的文献集。此外，围绕冷战时期的一些重大国际事件，现在各有关国家（中国除外）的档案都已经全面开放。以 19 年的波匈事件为例，不仅匈牙利、波兰、俄国以及西方的档案大量公布出来，人们甚至找到了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等国家的相关档案。在这样丰富的史料基础上，只要研究者用心、刻苦，很多历史真相应该是可以探明的。但可惜的是，在我们目前的研究中，这些唾手可得的珍贵史料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利用，还是有很多人热衷于按照自己头脑中固有的成见或构想，变换各种角度和理念去解释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的原因，却很少踏踏实实地分析和解读已经呈现出来的丰富史料，首先搞清楚苏联历史发展本身的过程和一些重大事件，而历史的因果关系实际上就蕴藏在历史过程中。甚至还有人沿袭“文革”时期的做法，迎合某种政治需要去任意剪裁历史，这就更令人可

再清楚不过了。即使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一度接受了“五族共和”观念，其后的种种言论显示，他对中华国家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也仍旧是以古代传统的汉族国家为基础的。换言之，孙中山所爱的国家，以及他对国家主权、疆域和领土的理解，不仅在他的国家观形成过程中是变动着的，更与我们今天的认识有相当的差距。故即使我们发现孙中山确有试图出让满蒙权益的事实，也并不妨碍我们相信孙中山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

静下心来 看档案，踏踏实实 做学问

北京大学历史系 沈志华

《历史研究》创办 50 周年，没有搞大张旗鼓的庆祝活动，也没有营造热热闹闹的场面，而是召开这样一个小型的、实实在在的学术座谈会，体现了一种务实精神，我很赞同。

说到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我没有专门的研究，关于历史学的功能，也谈不出多么高深的见解。说句实在的话，我之所以在 1 年前生意正红火的时候放弃经商，重返历史研究的学术殿堂，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个人兴趣所至。在我看来，研究历史的基本的和主要的目的，就是复原历史，就是以当代人的意识、观念、认知和感受，在最新发现和发掘出来的更丰富、更详实的史料的基础上，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同一段历史进程，同一个历史人物，同一起历史事件，为什么会成为不同时代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就是因为人们的意识和观念转变了，认知和感受不同了，就是因为出现了许多新的碑文、书简、档案、文献以及当事人回忆录之类的史料。于是，人们就不得不对过去的事情进行重新审视。在我看来，研究历史就像做拼图游戏，那些零散的构件就是史料，而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对这些丰富多彩、混杂重叠、真真假假的构件进行鉴别、筛选，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再按照自己的思维逻辑把它们拼装在一起，形成一幅图像——也就是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当然，这幅图像越接近于它本来的面目，就表明拼图者的功力越深厚，他也越有理由感到自身存在的价值。历史研究就是这样一种吸引我的“游戏”，每当发现了一些重要的、足以改变历史图像的新构件，我就激动不已，就有一股创作的冲动；每当拼装出一幅得到人们认可的，哪怕是一幅很小的图像，我也会有一种沾沾自喜的成就感，而这种感受又鼓励和催动我马不停蹄地去进行新的探索。

就我研究的领域（苏联史、冷战史）而言，与十几年前的情况完全不同，现在的第一手史料不是太少，而是太多。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俄国学者编纂的专题档案文献集不断涌现，这些专集不仅公布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这样高层决策的档案，还有涉及外交、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和部门的档案，乃至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如苏共对舆论和媒体的控制、苏联政府对历次社会动乱的处理等，都有专门的文献集。此外，围绕冷战时期的一些重大国际事件，现在各有关国家（中国除外）的档案都已经全面开放。以 19 年的波匈事件为例，不仅匈牙利、波兰、俄国以及西方的档案大量公布出来，人们甚至找到了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等国家的相关档案。在这样丰富的史料基础上，只要研究者用心、刻苦，很多历史真相应该是可以探明的。但可惜的是，在我们目前的研究中，这些唾手可得的珍贵史料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利用，还是有很多人热衷于按照自己头脑中固有的成见或构想，变换各种角度和理念去解释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的原因，却很少踏踏实实地分析和解读已经呈现出来的丰富史料，首先搞清楚苏联历史发展本身的过程和一些重大事件，而历史的因果关系实际上就蕴藏在历史过程中。甚至还有人沿袭“文革”时期的做法，迎合某种政治需要去任意剪裁历史，这就更令人可

再清楚不过了。即使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一度接受了“五族共和”观念，其后的种种言论显示，他对中华国家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也仍旧是以古代传统的汉族国家为基础的。换言之，孙中山所爱的国家，以及他对国家主权、疆域和领土的理解，不仅在他的国家观形成过程中是变动着的，更与我们今天的认识有相当的差距。故即使我们发现孙中山确有试图出让满蒙权益的事实，也并不妨碍我们相信孙中山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

静下心来 看档案，踏踏实实 做学问

北京大学历史系 沈志华

《历史研究》创办 5 周年，没有搞大张旗鼓的庆祝活动，也没有营造热热闹闹的场面，而是召开这样一个小型的、实实在在的学术座谈会，体现了一种务实精神，我很赞同。

说到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我没有专门的研究，关于历史学的功能，也谈不出多么高深的见解。说句实在的话，我之所以在 1 年前生意正红火的时候放弃经商，重返历史研究的学术殿堂，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个人兴趣所至。在我看来，研究历史的基本的和主要的目的，就是复原历史，就是以当代人的意识、观念、认知和感受，在最新发现和发掘出来的更丰富、更详实的史料的基础上，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同一段历史进程，同一个历史人物，同一起历史事件，为什么会成为不同时代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就是因为人们的意识和观念转变了，认知和感受不同了，就是因为出现了许多新的碑文、书简、档案、文献以及当事人回忆录之类的史料。于是，人们就不得不对过去的事情进行重新审视。在我看来，研究历史就像做拼图游戏，那些零散的构件就是史料，而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对这些丰富多彩、混杂重叠、真真假假的构件进行鉴别、筛选，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再按照自己的思维逻辑把它们拼装在一起，形成一幅图像——也就是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当然，这幅图像越接近于它本来的面目，就表明拼图者的功力越深厚，他也越有理由感到自身存在的价值。历史研究就是这样一种吸引我的“游戏”，每当发现了一些重要的、足以改变历史图像的新构件，我就激动不已，就有一股创作的冲动；每当拼装出一幅得到人们认可的，哪怕是一幅很小的图像，我也会有一种沾沾自喜的成就感，而这种感受又鼓励和催动我马不停蹄地去进行新的探索。

就我研究的领域（苏联史、冷战史）而言，与十几年前的情况完全不同，现在的第一手史料不是太少，而是太多。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俄国学者编纂的专题档案文献集不断涌现，这些专集不仅公布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这样高层决策的档案，还有涉及外交、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和部门的档案，乃至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如苏共对舆论和媒体的控制、苏联政府对历次社会动乱的处理等，都有专门的文献集。此外，围绕冷战时期的一些重大国际事件，现在各有关国家（中国除外）的档案都已经全面开放。以 19 年的波匈事件为例，不仅匈牙利、波兰、俄国以及西方的档案大量公布出来，人们甚至找到了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等国家的相关档案。在这样丰富的史料基础上，只要研究者用心、刻苦，很多历史真相应该是可以探明的。但可惜的是，在我们目前的研究中，这些唾手可得的珍贵史料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利用，还是有很多人热衷于按照自己头脑中固有的成见或构想，变换各种角度和理念去解释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的原因，却很少踏踏实实地分析和解读已经呈现出来的丰富史料，首先搞清楚苏联历史发展本身的过程和一些重大事件，而历史的因果关系实际上就蕴藏在历史过程中。甚至还有人沿袭“文革”时期的做法，迎合某种政治需要去任意剪裁历史，这就更令人可

相维（参看拙著《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这种“拟化”的能力，使它在面临社会分化、社会变迁时，得以吸纳和改造各种异己要素，穿越周期性的振荡实现了自我更新。那么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个古老文明的政治传统，其深层结构和历史惯性能保持多久？它是否有经蜕变和新生为人类发展开辟新前景的可能性？最终的答案只能由历史做出，但人们期望做出判断，中国史学有义务提供参考，它们本身也是影响历史进程的因素。

微观历史研究的理论意义

北京大学历史系 彭小瑜

历史研究总是难以脱离社会思潮和社会科学前沿发展的影响。但是重视文献考订和史实的细节，重视对具体问题的研究，通过寻求事实来寻找真理，这样一种小心和实证的史学方法是否就是缺乏理论深度？考据一个具体的（甚至是琐碎的）历史问题是否就没有理论的意义？是否就忽视了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对这样的设问，谁都知道回答应该是否定的。但是在学术实践中，起码在我们的世界历史研究和教学中，大而化之地、粗线条地处理历史问题的习惯至今还是比较流行的。我在这里主要以西方中世纪史学史的两个例子来说明，微观历史研究的理论意义有时恰恰完美地体现在小心翼翼的事实求证之中。

（一）文献考据学的重要思想意义

在中世纪西欧，史家通常会混淆事实和圣经故事，他们会将各种关于奇迹的传说记载下来，不辨析其真伪，和真实的历史排列在一起。大量的圣徒传就是例证。宗教改革之后，新教各派对中世纪盛行的圣徒崇拜不予承认，天主教会内部也有学者怀疑圣徒传记的可靠性。可见，此时的学者已经觉得中世纪混淆事实和神迹的思维方式不可行。11世纪的天主教修士博兰（Jean Bolland, 1566-1665）和马比荣（Jean Mabillon, 1623-1690）开创了中世纪文献考据学，提出近代文献考订的一些基本原则。科学的文献考订彻底改变了教会史学者对宗教信仰和历史事实之间关系的处理方法。他们意识到，即使是不利于教会的事实也不应该回避，尊重事实和坚持真理二者是可以而且必须统一的。中世纪的史学传统被彻底抛弃了，再也没有严肃的学者觉得可以将圣经故事等同于历史事实。

（二）梅特兰的普通法历史研究

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在各个学科都有所体现。维特根斯坦等分析哲学的代表试图清算包罗万象的形而上学理论体系。在社会学领域，有涂尔干的结构功能主义。在史学界，启蒙主义或浪漫主义的学者曾经将历史研究看成是为某一特定的宏观理论体系服务的工具。在英国法制史方面，斯塔布斯（William Stubbs, 1825-1901）开始重视实证，但依然受到马考莱（Thomas B. Macaulay, 1800-1860）的影响，其著作带有浓厚的形而上学色彩。他还是坚持认为，英国的自由民主传统始自塔西陀笔下的日耳曼人，是种族的本能；宪法是爱国情操和坚忍不拔品格的产物，是明智君主和政治家奋斗的结果。梅特兰（Frederick Maitland, 1814-1889）的普通法历史研究改变了这一状况。他的观点是，中世纪不再应该是后人想像中的中世纪，而应该是经验——历史文献——所能证实的中世纪。他的史学方法是，从原始的法律文件出发，追溯普通法如何起源，了解它如何在适应社会需要的过程中发展自己的功能和结构。他认为，了解英

相维（参看拙著《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这种“拟化”的能力，使它在面临社会分化、社会变迁时，得以吸纳和改造各种异己要素，穿越周期性的振荡实现了自我更新。那么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个古老文明的政治传统，其深层结构和历史惯性能保持多久？它是否有经蜕变和新生为人类发展开辟新前景的可能性？最终的答案只能由历史做出，但人们期望做出判断，中国史学有义务提供参考，它们本身也是影响历史进程的因素。

微观历史研究的理论意义

北京大学历史系 彭小瑜

历史研究总是难以脱离社会思潮和社会科学前沿发展的影响。但是重视文献考订和史实的细节，重视对具体问题的研究，通过寻求事实来寻找真理，这样一种小心和实证的史学方法是否就是缺乏理论深度？考据一个具体的（甚至是琐碎的）历史问题是否就没有理论的意义？是否就忽视了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对这样的设问，谁都知道回答应该是否定的。但是在学术实践中，起码在我们的世界历史研究和教学中，大而化之地、粗线条地处理历史问题的习惯至今还是比较流行的。我在这里主要以西方中世纪史学史的两个例子来说明，微观历史研究的理论意义有时恰恰完美地体现在小心翼翼的事实求证之中。

（一）文献考据学的重要思想意义

在中世纪西欧，史家通常会混淆事实和圣经故事，他们会将各种关于奇迹的传说记载下来，不辨析其真伪，和真实的历史排列在一起。大量的圣徒传就是例证。宗教改革之后，新教各派对中世纪盛行的圣徒崇拜不予承认，天主教会内部也有学者怀疑圣徒传记的可靠性。可见，此时的学者已经觉得中世纪混淆事实和神迹的思维方式不可行。11世纪的天主教修士博兰（Jean Bolland, 1566-1665）和马比荣（Jean Mabillon, 1623-1690）开创了中世纪文献考据学，提出近代文献考订的一些基本原则。科学的文献考订彻底改变了教会史学者对宗教信仰和历史事实之间关系的处理方法。他们意识到，即使是不利于教会的事实也不应该回避，尊重事实和坚持真理二者是可以而且必须统一的。中世纪的史学传统被彻底抛弃了，再也没有严肃的学者觉得可以将圣经故事等同于历史事实。

（二）梅特兰的普通法历史研究

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在各个学科都有所体现。维特根斯坦等分析哲学的代表试图清算包罗万象的形而上学理论体系。在社会学领域，有涂尔干的结构功能主义。在史学界，启蒙主义或浪漫主义的学者曾经将历史研究看成是为某一特定的宏观理论体系服务的工具。在英国法制史方面，斯塔布斯（William Stubbs, 1825-1901）开始重视实证，但依然受到马考莱（Thomas B. Macaulay, 1800-1860）的影响，其著作带有浓厚的形而上学色彩。他还是坚持认为，英国的自由民主传统始自塔西陀笔下的日耳曼人，是种族的本能；宪法是爱国情操和坚忍不拔品格的产物，是明智君主和政治家奋斗的结果。梅特兰（Frederick Maitland, 1814-1889）的普通法历史研究改变了这一状况。他的观点是，中世纪不再应该是后人想像中的中世纪，而应该是经验——历史文献——所能证实的中世纪。他的史学方法是，从原始的法律文件出发，追溯普通法如何起源，了解它如何在适应社会需要的过程中发展自己的功能和结构。他认为，了解英

相维（参看拙著《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这种“拟化”的能力，使它在面临社会分化、社会变迁时，得以吸纳和改造各种异己要素，穿越周期性的振荡实现了自我更新。那么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个古老文明的政治传统，其深层结构和历史惯性能保持多久？它是否有经蜕变和新生为人类发展开辟新前景的可能性？最终的答案只能由历史做出，但人们期望做出判断，中国史学有义务提供参考，它们本身也是影响历史进程的因素。

微观历史研究的理论意义

北京大学历史系 彭小瑜

历史研究总是难以脱离社会思潮和社会科学前沿发展的影响。但是重视文献考订和史实的细节，重视对具体问题的研究，通过寻求事实来寻找真理，这样一种小心和实证的史学方法是否就是缺乏理论深度？考据一个具体的（甚至是琐碎的）历史问题是否就没有理论的意义？是否就忽视了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对这样的设问，谁都知道回答应该是否定的。但是在学术实践中，起码在我们的世界历史研究和教学中，大而化之地、粗线条地处理历史问题的习惯至今还是比较流行的。我在这里主要以西方中世纪史学史的两个例子来说明，微观历史研究的理论意义有时恰恰完美地体现在小心翼翼的事实求证之中。

（一）文献考据学的重要思想意义

在中世纪西欧，史家通常会混淆事实和圣经故事，他们会将各种关于奇迹的传说记载下来，不辨析其真伪，和真实的历史排列在一起。大量的圣徒传就是例证。宗教改革之后，新教各派对中世纪盛行的圣徒崇拜不予承认，天主教会内部也有学者怀疑圣徒传记的可靠性。可见，此时的学者已经觉得中世纪混淆事实和神迹的思维方式不可行。11世纪的天主教修士博兰（Jean Bolland, 1564-1665）和马比荣（Jean Mabillon, 1623-1690）开创了中世纪文献考据学，提出近代文献考订的一些基本原则。科学的文献考订彻底改变了教会史学者对宗教信仰和历史事实之间关系的处理方法。他们意识到，即使是不利于教会的事实也不应该回避，尊重事实和坚持真理二者是可以而且必须统一的。中世纪的史学传统被彻底抛弃了，再也没有严肃的学者觉得可以将圣经故事等同于历史事实。

（二）梅特兰的普通法历史研究

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在各个学科都有所体现。维特根斯坦等分析哲学的代表试图清算包罗万象的形而上学理论体系。在社会学领域，有涂尔干的结构功能主义。在史学界，启蒙主义或浪漫主义的学者曾经将历史研究看成是为某一特定的宏观理论体系服务的工具。在英国法制史方面，斯塔布斯（William Stubbs, 1825-1901）开始重视实证，但依然受到马考莱（Thomas B. Macaulay, 1800-1860）的影响，其著作带有浓厚的形而上学色彩。他还是坚持认为，英国的自由民主传统始自塔西陀笔下的日耳曼人，是种族的本能；宪法是爱国情操和坚忍不拔品格的产物，是明智君主和政治家奋斗的结果。梅特兰（Frederick Maitland, 1814-1889）的普通法历史研究改变了这一状况。他的观点是，中世纪不再应该是后人想像中的中世纪，而应该是经验——历史文献——所能证实的中世纪。他的史学方法是，从原始的法律文件出发，追溯普通法如何起源，了解它如何在适应社会需要的过程中发展自己的功能和结构。他认为，了解英

相维（参看拙著《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这种“拟化”的能力，使它在面临社会分化、社会变迁时，得以吸纳和改造各种异己要素，穿越周期性的振荡实现了自我更新。那么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个古老文明的政治传统，其深层结构和历史惯性能保持多久？它是否有经蜕变和新生为人类发展开辟新前景的可能性？最终的答案只能由历史做出，但人们期望做出判断，中国史学有义务提供参考，它们本身也是影响历史进程的因素。

微观历史研究的理论意义

北京大学历史系 彭小瑜

历史研究总是难以脱离社会思潮和社会科学前沿发展的影响。但是重视文献考订和史实的细节，重视对具体问题的研究，通过寻求事实来寻找真理，这样一种小心和实证的史学方法是否就是缺乏理论深度？考据一个具体的（甚至是琐碎的）历史问题是否就没有理论的意义？是否就忽视了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对这样的设问，谁都知道回答应该是否定的。但是在学术实践中，起码在我们的世界历史研究和教学中，大而化之地、粗线条地处理历史问题的习惯至今还是比较流行的。我在这里主要以西方中世纪史学史的两个例子来说明，微观历史研究的理论意义有时恰恰完美地体现在小心翼翼的事实求证之中。

（一）文献考据学的重要思想意义

在中世纪西欧，史家通常会混淆事实和圣经故事，他们会将各种关于奇迹的传说记载下来，不辨析其真伪，和真实的历史排列在一起。大量的圣徒传就是例证。宗教改革之后，新教各派对中世纪盛行的圣徒崇拜不予承认，天主教会内部也有学者怀疑圣徒传记的可靠性。可见，此时的学者已经觉得中世纪混淆事实和神迹的思维方式不可行。11世纪的天主教修士博兰（Jean Bolland, 1566-1665）和马比荣（Jean Mabillon, 1623-1690）开创了中世纪文献考据学，提出近代文献考订的一些基本原则。科学的文献考订彻底改变了教会史学者对宗教信仰和历史事实之间关系的处理方法。他们意识到，即使是不利于教会的事实也不应该回避，尊重事实和坚持真理二者是可以而且必须统一的。中世纪的史学传统被彻底抛弃了，再也没有严肃的学者觉得可以将圣经故事等同于历史事实。

（二）梅特兰的普通法历史研究

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在各个学科都有所体现。维特根斯坦等分析哲学的代表试图清算包罗万象的形而上学理论体系。在社会学领域，有涂尔干的结构功能主义。在史学界，启蒙主义或浪漫主义的学者曾经将历史研究看成是为某一特定的宏观理论体系服务的工具。在英国法制史方面，斯塔布斯（William Stubbs, 1825-1901）开始重视实证，但依然受到马考莱（Thomas B. Macaulay, 1800-1874）的影响，其著作带有浓厚的形而上学色彩。他还是坚持认为，英国的自由民主传统始自塔西陀笔下的日耳曼人，是种族的本能；宪法是爱国情操和坚忍不拔品格的产物，是明智君主和政治家奋斗的结果。梅特兰（Frederick Maitland, 1814-1889）的普通法历史研究改变了这一状况。他的观点是，中世纪不再应该是后人想像中的中世纪，而应该是经验——历史文献——所能证实的中世纪。他的史学方法是，从原始的法律文件出发，追溯普通法如何起源，了解它如何在适应社会需要的过程中发展自己的功能和结构。他认为，了解英

相维（参看拙著《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这种“拟化”的能力，使它在面临社会分化、社会变迁时，得以吸纳和改造各种异己要素，穿越周期性的振荡实现了自我更新。那么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个古老文明的政治传统，其深层结构和历史惯性能保持多久？它是否有经蜕变和新生为人类发展开辟新前景的可能性？最终的答案只能由历史做出，但人们期望做出判断，中国史学有义务提供参考，它们本身也是影响历史进程的因素。

微观历史研究的理论意义

北京大学历史系 彭小瑜

历史研究总是难以脱离社会思潮和社会科学前沿发展的影响。但是重视文献考订和史实的细节，重视对具体问题的研究，通过寻求事实来寻找真理，这样一种小心和实证的史学方法是否就是缺乏理论深度？考据一个具体的（甚至是琐碎的）历史问题是否就没有理论的意义？是否就忽视了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对这样的设问，谁都知道回答应该是否定的。但是在学术实践中，起码在我们的世界历史研究和教学中，大而化之地、粗线条地处理历史问题的习惯至今还是比较流行的。我在这里主要以西方中世纪史学史的两个例子来说明，微观历史研究的理论意义有时恰恰完美地体现在小心翼翼的事实求证之中。

（一）文献考据学的重要思想意义

在中世纪西欧，史家通常会混淆事实和圣经故事，他们会将各种关于奇迹的传说记载下来，不辨析其真伪，和真实的历史排列在一起。大量的圣徒传就是例证。宗教改革之后，新教各派对中世纪盛行的圣徒崇拜不予承认，天主教会内部也有学者怀疑圣徒传记的可靠性。可见，此时的学者已经觉得中世纪混淆事实和神迹的思维方式不可行。11世纪的天主教修士博兰（Jean Bolland, 1566-1665）和马比荣（Jean Mabillon, 1623-1690）开创了中世纪文献考据学，提出近代文献考订的一些基本原则。科学的文献考订彻底改变了教会史学者对宗教信仰和历史事实之间关系的处理方法。他们意识到，即使是不利于教会的事实也不应该回避，尊重事实和坚持真理二者是可以而且必须统一的。中世纪的史学传统被彻底抛弃了，再也没有严肃的学者觉得可以将圣经故事等同于历史事实。

（二）梅特兰的普通法历史研究

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在各个学科都有所体现。维特根斯坦等分析哲学的代表试图清算包罗万象的形而上学理论体系。在社会学领域，有涂尔干的结构功能主义。在史学界，启蒙主义或浪漫主义的学者曾经将历史研究看成是为某一特定的宏观理论体系服务的工具。在英国法制史方面，斯塔布斯（William Stubbs, 1825-1901）开始重视实证，但依然受到马考莱（Thomas B. Macaulay, 1800-1874）的影响，其著作带有浓厚的形而上学色彩。他还是坚持认为，英国的自由民主传统始自塔西陀笔下的日耳曼人，是种族的本能；宪法是爱国情操和坚忍不拔品格的产物，是明智君主和政治家奋斗的结果。梅特兰（Frederick Maitland, 1814-1881）的普通法历史研究改变了这一状况。他的观点是，中世纪不再应该是后人想像中的中世纪，而应该是经验——历史文献——所能证实的中世纪。他的史学方法是，从原始的法律文件出发，追溯普通法如何起源，了解它如何在适应社会需要的过程中发展自己的功能和结构。他认为，了解英

相维（参看拙著《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这种“拟化”的能力，使它在面临社会分化、社会变迁时，得以吸纳和改造各种异己要素，穿越周期性的振荡实现了自我更新。那么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个古老文明的政治传统，其深层结构和历史惯性能保持多久？它是否有经蜕变和新生为人类发展开辟新前景的可能性？最终的答案只能由历史做出，但人们期望做出判断，中国史学有义务提供参考，它们本身也是影响历史进程的因素。

微观历史研究的理论意义

北京大学历史系 彭小瑜

历史研究总是难以脱离社会思潮和社会科学前沿发展的影响。但是重视文献考订和史实的细节，重视对具体问题的研究，通过寻求事实来寻找真理，这样一种小心和实证的史学方法是否就是缺乏理论深度？考据一个具体的（甚至是琐碎的）历史问题是否就没有理论的意义？是否就忽视了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对这样的设问，谁都知道回答应该是否定的。但是在学术实践中，起码在我们的世界历史研究和教学中，大而化之地、粗线条地处理历史问题的习惯至今还是比较流行的。我在这里主要以西方中世纪史学史的两个例子来说明，微观历史研究的理论意义有时恰恰完美地体现在小心翼翼的事实求证之中。

（一）文献考据学的重要思想意义

在中世纪西欧，史家通常会混淆事实和圣经故事，他们会将各种关于奇迹的传说记载下来，不辨析其真伪，和真实的历史排列在一起。大量的圣徒传就是例证。宗教改革之后，新教各派对中世纪盛行的圣徒崇拜不予承认，天主教会内部也有学者怀疑圣徒传记的可靠性。可见，此时的学者已经觉得中世纪混淆事实和神迹的思维方式不可行。11世纪的天主教修士博兰（Jean Bolland, 1569-1665）和马比荣（Jean Mabillon, 1623-1690）开创了中世纪文献考据学，提出近代文献考订的一些基本原则。科学的文献考订彻底改变了教会史学者对宗教信仰和历史事实之间关系的处理方法。他们意识到，即使是不利于教会的事实也不应该回避，尊重事实和坚持真理二者是可以而且必须统一的。中世纪的史学传统被彻底抛弃了，再也没有严肃的学者觉得可以将圣经故事等同于历史事实。

（二）梅特兰的普通法历史研究

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在各个学科都有所体现。维特根斯坦等分析哲学的代表试图清算包罗万象的形而上学理论体系。在社会学领域，有涂尔干的结构功能主义。在史学界，启蒙主义或浪漫主义的学者曾经将历史研究看成是为某一特定的宏观理论体系服务的工具。在英国法制史方面，斯塔布斯（William Stubbs, 1825-1901）开始重视实证，但依然受到马考莱（Thomas B. Macaulay, 1800-1874）的影响，其著作带有浓厚的形而上学色彩。他还是坚持认为，英国的自由民主传统始自塔西陀笔下的日耳曼人，是种族的本能；宪法是爱国情操和坚忍不拔品格的产物，是明智君主和政治家奋斗的结果。梅特兰（Frederick Maitland, 1814-1889）的普通法历史研究改变了这一状况。他的观点是，中世纪不再应该是后人想像中的中世纪，而应该是经验——历史文献——所能证实的中世纪。他的史学方法是，从原始的法律文件出发，追溯普通法如何起源，了解它如何在适应社会需要的过程中发展自己的功能和结构。他认为，了解英

相维（参看拙著《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这种“拟化”的能力，使它在面临社会分化、社会变迁时，得以吸纳和改造各种异己要素，穿越周期性的振荡实现了自我更新。那么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个古老文明的政治传统，其深层结构和历史惯性能保持多久？它是否有经蜕变和新生为人类发展开辟新前景的可能性？最终的答案只能由历史做出，但人们期望做出判断，中国史学有义务提供参考，它们本身也是影响历史进程的因素。

微观历史研究的理论意义

北京大学历史系 彭小瑜

历史研究总是难以脱离社会思潮和社会科学前沿发展的影响。但是重视文献考订和史实的细节，重视对具体问题的研究，通过寻求事实来寻找真理，这样一种小心和实证的史学方法是否就是缺乏理论深度？考据一个具体的（甚至是琐碎的）历史问题是否就没有理论的意义？是否就忽视了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对这样的设问，谁都知道回答应该是否定的。但是在学术实践中，起码在我们的世界历史研究和教学中，大而化之地、粗线条地处理历史问题的习惯至今还是比较流行的。我在这里主要以西方中世纪史学史的两个例子来说明，微观历史研究的理论意义有时恰恰完美地体现在小心翼翼的事实求证之中。

（一）文献考据学的重要思想意义

在中世纪西欧，史家通常会混淆事实和圣经故事，他们会将各种关于奇迹的传说记载下来，不辨析其真伪，和真实的历史排列在一起。大量的圣徒传就是例证。宗教改革之后，新教各派对中世纪盛行的圣徒崇拜不予承认，天主教会内部也有学者怀疑圣徒传记的可靠性。可见，此时的学者已经觉得中世纪混淆事实和神迹的思维方式不可行。11世纪的天主教修士博兰（Jean Bolland, 1566-1665）和马比荣（Jean Mabillon, 1623-1690）开创了中世纪文献考据学，提出近代文献考订的一些基本原则。科学的文献考订彻底改变了教会史学者对宗教信仰和历史事实之间关系的处理方法。他们意识到，即使是不利于教会的事实也不应该回避，尊重事实和坚持真理二者是可以而且必须统一的。中世纪的史学传统被彻底抛弃了，再也没有严肃的学者觉得可以将圣经故事等同于历史事实。

（二）梅特兰的普通法历史研究

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在各个学科都有所体现。维特根斯坦等分析哲学的代表试图清算包罗万象的形而上学理论体系。在社会学领域，有涂尔干的结构功能主义。在史学界，启蒙主义或浪漫主义的学者曾经将历史研究看成是为某一特定的宏观理论体系服务的工具。在英国法制史方面，斯塔布斯（William Stubbs, 1825-1901）开始重视实证，但依然受到马考莱（Thomas B. Macaulay, 1800-1860）的影响，其著作带有浓厚的形而上学色彩。他还是坚持认为，英国的自由民主传统始自塔西陀笔下的日耳曼人，是种族的本能；宪法是爱国情操和坚忍不拔品格的产物，是明智君主和政治家奋斗的结果。梅特兰（Frederick Maitland, 1814-1880）的普通法历史研究改变了这一状况。他的观点是，中世纪不再应该是后人想像中的中世纪，而应该是经验——历史文献——所能证实的中世纪。他的史学方法是，从原始的法律文件出发，追溯普通法如何起源，了解它如何在适应社会需要的过程中发展自己的功能和结构。他认为，了解英